

回眸、凝視與前瞻： 2018-2019 年臺灣人物研究的評析

李毓嵐、* 李昭容**

一、前言

人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雖然歷史研究日新月異，近年來出現了感覺史、情感史、歷史記憶、全球史等新的研究取徑，¹ 在臺灣史範疇也有研究者投注於動物、植物、兒童等新興領域。² 人物與家族史相關研究雖屬傳統領域的範疇，其研究取向仍可反映時代變遷及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加上近年來研究運用新出土的史料，致使人物與家族史屢有佳作，仍屬不退潮流的研究領域。

以 2010-2017 年的人物研究成果為例，在新史料的運用上，如陳翠蓮利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之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檔案，指出身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的陳逸松（1907-2000）與劉明（1902-199），私下與軍統特務機關密切合作，成為當局利用的棋子，但事後卻遭到迫害，導致兩人最後分別投向中國共產黨與反對運動；許雪姬以楊肇嘉（1892-1976）留下的〈六然居典藏史料〉、上海市檔案館有關臺灣人團體在上海活動的資料、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楊肇嘉戰犯等資料，確認楊肇嘉曾當選第一任上海同鄉會理事長，並釐清其捲入戰犯案的來龍去脈。³

其次，利用日記撰述的人物研究，開發不少新文化史議題。如廖振富介紹〈傅錫祺日記〉在文學與文化議題的史料價值，並討論傅錫祺（1972-1946）與親人的互動及其家庭觀。陳文松依據《吳新榮日記全集》，研究吳新榮（1907-1967）從事打麻雀（麻將）與圍棋等娛樂活動的意義。林偉盛以〈楊基振日記〉，分析戰後楊基振（1911-1990）的從政與交友情形。莊勝全以《黃旺成先生日記》為主要資料，探究黃旺成（1888-1979）於 1920 年代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及其先後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報社，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心路歷程。李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¹ 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新北：聯經，2019）。

²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2020）；蔡思薇，〈日治前期臺灣的植物調查（1895-192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黃子寧，〈利益囚仔：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節活動—以乳兒選獎會為核心〉，收入陳俊強、洪健榮主編，《臺北州檔案與文書運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2020），頁 138-180。此外，2020 年 6 月出版之《成大歷史學報》第 58 號，為動物史專號，收錄 8 篇與動物史相關論著。

³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21：3（2014.9），頁 137-180；許雪姬，〈戰後上海的臺灣人團體及楊肇嘉的角色：兼論其所涉入的「戰犯」案（1943-1947）〉，《興大歷史學報》30（2016.6），頁 81-116。

毓嵐利用《灌園先生日記》，介紹林獻堂（1881-1956）身邊之妻子、女兒、媳婦等生活中的女性，另述其對「霧峰一新會」的付出；其後李毓嵐又以在蔡蓮舫（1875-1936）家中擔任家庭教師的黃旺成（1888-1979）日記，描述蔡蓮舫與其妾、養子和親生子的互動情形；並以曾任鹿港街長，亦為櫟社成員的陳懷澄（1877-1940）日記，分析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黃冠彰以林獻堂與吳新榮日記，探討兩人戰後的政理想念。⁴

相較於日記，遊記亦是依時序寫下的文字記錄，只是其書寫限定於旅遊經歷，如許雪姬曾對日治時期有歐美遊歷經驗的林獻堂與顏國年（1886-1937）之遊記進行比較。再次，在人物比較方面，許雪姬以楊雲萍（1906-2000）、陳逸松、呂赫若（1914-1951）這三位互相認識、惺惺相惜的文化人為主角，討論其人生不同階段的共相與殊相，基本上戰後楊雲萍進入臺灣省編譯館，卻因撤館而任臺大教職；陳逸松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呂赫若加入共產黨，賣祖厝開印刷廠，最後進入武裝基地，終至意外喪生。⁵

再者，區域人物與家族史亦有欣欣向榮的成果。許佩賢以新竹張式毅（1890-1977）為研究對象，指出其在國語學校畢業後，從最初擔任新竹公學校教師，到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香山庄長，以及轉業工商業界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專賣權拉攏的對象，其人生進路選擇，都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陳文松專注於草屯洪姓一族，討論洪清江（1881-1964）、洪深坑（1897-1941）、吳萬成（1902-？）諸位雙語學歷菁英對殖民政治的參與及其呈現的多元相貌，並論述洪元煌（1883-1958）在日治與戰後的政治境遇；李昭容致力研究鹿港的重要家族，分別有專書討論鹿港丁家與慶昌行陳家的發展與變遷，並釐清陳克勸之孫陳祈與其後代陳質芬、陳藻雲、陳子敏之事蹟；林慶弧研究林石後代林志芳家族與臺中太平的開發；張素玢討論北斗林家林伯廷、林伯餘、林文騰等人在不同政權下的不同認同選擇與境遇。⁶

最後，以一般讀者為訴求對象的大眾史學作品，也有蓬勃的發展。廖振富《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分別從詩作、朋友、休閒娛樂等不同層面切入，使讀者對林獻堂有更深入的认识；蘇全正、郭双富《劇場演義：演義娛樂現代化的天外天劇場》除介紹天外天劇場的創

⁴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2011.12），頁201-239；廖振富、張明權，〈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3（2013.9），頁125-175；陳文松，〈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打麻雀」—以吳新榮等人的經驗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45（2013.12），頁129-176；陳文松，〈從躲空襲到避政治：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吳新榮的圍棋戲〉，《臺灣史研究》23：1（2016.3），頁121-153；林偉盛，〈由楊基振日記看他的從政與交友（1957-1960）〉，《臺灣風物》63：1（2013.3），頁61-103；莊勝全，〈紅塵中有閒日月：1920年代黃旺成的社會觀察、政治參與及思想資源〉，《臺灣史研究》23：2（2016.6），頁111-164；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興大歷史學報》24（2012.6），頁59-98；李毓嵐，〈林獻堂與婦女教育—以霧峰一新會為例〉，《臺灣學研究》13（2012.6），頁93-126；李毓嵐，〈1920年代臺中士紳蔡蓮舫的家庭生活〉，《臺灣史研究》20：4（2013.12），頁51-98；李毓嵐，〈陳懷澄的街長公務職責與文人生活：以陳懷澄日記為論述中心（1920-1932）〉，《臺灣史研究》23：1（2016.3），頁75-120；黃冠彰，〈戰後臺籍菁英對政府施政之肆應—以林獻堂與吳新榮為探討中心（1945-1955）〉（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⁵ 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臺灣文獻》62：4（2011.12），頁161-219；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師大臺灣史學報》9（2016.12），頁53-98。

⁶ 許佩賢，〈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毅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24：3（2013.9），頁135-183；陳文松，〈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臺灣史研究》18：4（2011.12），頁57-108；陳文松，〈草屯洪元煌的兩個戰後及其傳奇一生〉，《臺灣風物》66：2（2016.6），頁53-126；李昭容，〈鹿港丁家大宅〉（臺中：晨星，2010）；李昭容，〈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續探〉（臺中：晨星，2011）；李昭容，〈宜樓掬月意樓春—鹿港慶昌家族史續探〉（臺中：晨星，2015）；李昭容，〈鹿港十宜樓陳祈及其後代考〉，《興大歷史學報》29（2014.12）頁25-62；林慶弧，〈林志芳家族與太平地區的開發〉，《臺灣文獻》62：3（2011.9）頁227-272；張素玢，〈世變下的北斗林家〉，《臺灣學研究》13（2012.6），頁33-64。陳文松在論述吳萬成的事蹟時，亦以吳萬成親筆所寫的兩本日記為主要資料。

建，亦述及劇場主人吳鸞旂家族成員的事蹟；曾得標、林景淵則著有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1917-2008）的傳記。⁷

基於前人累積的豐碩成果，本文將聚焦於近兩年人物研究的相關論著，研究範圍以專書、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為主，回憶錄、口述歷史及自傳則不予列入。另外，家族史研究是以一群有血緣關係的人物為主，探討其與區域社會之間的互動與發展，與人物研究有相同屬性，亦列入本文評析的對象。至於時間斷限鎖定 2018-2019 年，原先是為配合「2018-201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要求，不過以這兩年為觀察點，猶如探索時間長河的一個縱剖面，有其代表性，且本文在前言也對 2010-2017 年的人物研究概況略作介紹，故應能反映近年來學界對臺灣人物的研究趨勢。

2018-2019 年在臺灣人物與家族史範疇共有 186 篇／本相關論著，本文依據人物屬性不同，分成早期與清代人物、乙未戰爭人物、政治人物、經濟人物、跨域流動人物、社會領導階層與地方菁英、女性研究、原住民、宗教人物、家族史、學術人物、文人作家、藝術類人物、體育類人物等十四大類予以分類討論。必須說明的是，若一位人物具有多元屬性，則以其較突出、鮮明的屬性歸類，例如謝雪紅是臺共創始人之一，是政治人物，同時戰後投奔中國，亦是跨域流動人物，但因其落土不凋的兩夜花之女性形象廣為人知，故本文歸類於女性研究；又如西鄉菊次郎、內海忠司、安藤利吉分別為地方首長與總督，屬政治人物，但因其為來臺日本人，歸類為跨域流動人物，會更為貼切。

二、政治經濟社會人物研究回顧

延續 2010-2017 年人物與家族史研究的榮景，2018-2019 年此領域亦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茲分類介紹於下。

（一）早期與清代人物

1. 17 世紀人物：翁佳音〈複數海賊王－鄭芝龍與他的前後輩〉以長期結構史為研究視角，提出 17 世紀東亞海域的歷史與人物活動與其長期結構有關，例如鄭芝龍以「海賊」身分崛起，後接受官府「招安」，期間陸續向商船徵收「報水」等舉止，均非他所獨有，而是結構所產，只是鄭芝龍表現比較突出。其次，廈門島與同安縣之泉州海上勢力，向來與漳州比較親近；漳、潮雖不同省，卻在社會行動上有一體之一面，此情形至 18 世紀亦然，例如蔡牽出身泉州同安，曾與其合作的朱瀆為漳州人，而朱瀆曾駕駛潮州著名的紅頭船，均可看出長期 17 世紀結構史的影響。楊彥杰〈何斌相關史事研究〉指出何斌父子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翻譯員，但為鄭成功舊識，與鄭泰關係密切，他們皆出身福建南安，約於 1647 年抵臺並先

⁷ 廖振富，《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蘇全正、郭双富《劇場演義：演義娛樂現代化的天外天劇場》（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7）；曾得標、林景淵，《踢躂膠彩：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7）。

後受雇於荷蘭，1659年何斌為鄭成功在臺收稅被揭發後，促使其出走臺灣，造成鄭成功勢力的增長。⁸

2. 清代人物：民變與抗清事件，近來注意到太平天國時於臺灣以天德起義的林恭事件，計有謝宗佑〈民變、豪強與官府：十九世紀臺灣林萬掌家族的發展〉及毛帝勝〈望族、進士、抗清者—試探清代新園港仔墘五房內林家的發展與傳奇〉、徐崇哲〈林恭事件研究：以義首林萬掌家族與民變首領林恭進行初步考探〉。後二者為成功大學的學生，結集出版《被遺忘的天德元年：一八五三年林恭李石抗清事件》，誠如推薦序系主任陳文松所道，儘管論述未必達前人未達之境，而文字與史料的鋪陳也有待日後進一步考據和修訂，但對田野調查地方文獻爬梳有其熱忱與努力。比較此三位研究者，謝宗佑史料運用完整，如英國外交官史溫侯（R. Swinhoe, 1836-1877）訪臺留下的作品，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並以宏觀角度探討水底寮林家在林恭事件及林萬掌妻李招過世後逐漸凋零，反映出地方家族、社會以及官府間的互動，說明林家官府政策影響與自身人才凋零之雙重因素沒落，而毛帝勝著重鄉野傳奇，其解讀的林弓（林恭）家世，不同於謝宗佑認為林恭為林萬掌之族弟，正確的史實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再確認。⁹

林子庭〈戰後吳鳳形象的再建構與集體記憶的塑造（1945-1988）〉，討論戰後四十年間，吳鳳形象的重塑到最終瓦解的過程。早期吳鳳故事經歷重新書寫與再定義，被納入官方許可的論述；1966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展後，吳鳳進一步提升到國族神話的地位，吳鳳形象得以廣泛滲透入民間社會；1980年代後隨著反威權運動的興起，學界對吳鳳史實的挑戰動搖了吳鳳的正面形象，湯英伸事件更替正式為作為國族論述的吳鳳故事敲下喪鐘。¹⁰

（二）乙未戰爭人物

吳湯興、丘逢甲、劉永福有不少學者研究。大俠·道卡斯（薛雲峰）〈「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丘逢甲與吳湯興〉，運用法國年鑑學派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長時段分析法，提出「義民史觀」，主張客家人為抵禦現狀可能的劇烈變動，首創義民組織，而後成為貫穿清領臺灣時期普遍的社會特徵。若將一八九五乙未年客家人的抗日運動，視為清領時期的最後一次義民大動員，更能貼近事實真相，也更能理解吳湯興、徐驥以及姜紹祖為何甘於冒死抗日。徐博東、黃志平〈乙未武裝反割臺義軍統領吳湯興、徐驥、邱國霖大陸祖籍考〉，延續中國學者喜愛探討臺灣與中國淵源深厚之傳統，利用方志、族譜、維基百科等資料，考證吳湯興與徐驥的祖籍為現今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邱國霖的祖籍為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陳怡宏〈戰爭的再現：1895年乙未之役駐守臺南時期劉永福抗日形象〉，討論圖像與歌謠當中所呈現的劉永福形象，大

⁸ 翁佳音，〈複數海賊王－鄭芝龍與他的前後輩〉，《臺灣風物》69：3（2019.9），頁25-53；楊彥傑，〈何斌相關史事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65（2019.10），頁78-88。

⁹ 謝宗佑，〈民變、豪強與官府：十九世紀臺灣林萬掌家族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8）；徐崇哲，〈林恭事件研究：以義首林萬掌家族與民變首領林恭進行初步考探〉，《屏東文獻》22（2018.12），頁3-29；毛帝勝，〈望族、進士、抗清者：試探清代新園港仔墘五房內林家的發展與傳奇〉，《屏東文獻》22（2018.12），頁31-50；徐崇哲、毛帝勝著，《被遺忘的天德元年：一八五三年林恭李石抗清事件》（臺中：白象文化，2020）。

¹⁰ 林子庭，〈戰後吳鳳形象的再建構與集體記憶的塑造（1945-1988）〉，《臺灣史學雜誌》25（2018.12），頁58-107。

抵而言清國發行的畫報均強調劉永福孤軍留守臺灣，甚至英勇反攻大敗日軍，雖與歷史事實不符，但不失為一個替民眾發洩戰敗情緒的出口；反觀日方的創作者則是強調日軍的英勇，認為劉永福為殘兵敗將，展現作為戰勝方的立場；至於臺灣人僅能透過傳統歌仔冊的唸歌傳唱，在底層社會發出微弱但有力的控訴聲音。¹¹

（三）政治人物

1. 清代政治人物：蔡承豪〈精明強幹，任事實心－蔣元樞任官之評〉，利用故宮博物院所藏之《臺郡圖說》，探討曾任臺灣知府的蔣元樞（1739-1781）之任官事蹟，重點置於他自行捐俸，修築班兵營房。北臺官員北臺人物研究有王靜儀〈臺北設府與首任臺北知府林達泉在臺事蹟研究〉，書寫首任臺北知府林達泉（1830-1878）對設府之貢獻，郭佳玲〈陳星聚與清末北臺灣開發之研究〉詳述林達泉去世後，陳星聚（1817-1885）以臺灣府中路理番同知身分代理，直至實授知府期間的建設，包括改良社會風俗、振興文教、救濟貧困及籌建臺北城等。中部官員方面，蘇淑芬〈清領時期彰化縣知縣高鴻飛事蹟探討〉，敘述道咸年間擔任彰化知縣的高鴻飛（1797-1853），任內建立全臺第二座育嬰堂，專門收容女棄嬰；又注重教育，自己有時也到白沙書院擔任講座；還關心臺灣水旱災與消防問題。咸豐3年（1853）因李石事件殉職，身首異處，但民間仍流傳許多與其相關之靈異傳說。¹²

武官方面，王明燦〈王得祿從軍－擢陞提鎮統師緝捕海盜（1806-1808）〉探討王得祿（1770-1842）在鹿耳門戰役之後與許松出、李長庚共同追剿蔡牽，一路從署澎湖副將加兵銜，至補授福寧鎮總兵、南澳鎮水師總兵，擢升至福建水師提督的過程。賴玉玲〈總鎮一方：臺灣鎮總兵堅勇巴圖魯曾元福〉介紹福建晉江出身的曾元福（1810-1878）於1826年調任臺灣後，陸續弭平漳泉械鬥、林恭及戴潮春等事件，因此從把總、千總、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將到總兵官、加銜總兵提督一路晉級，並贏得「堅勇」巴圖魯號，可說臺灣一地造就其特殊的際遇。¹³

2. 戰後政治人物：賀淵〈陳儀在閩臺兩地的人事行政實踐及其思考〉一文，指出陳儀擔任福建省主席時，建立了一套縣級政府的人事行政制度，開辦縣政人員訓練所，並將訓練與任用、提拔、廢黜相結合，杜絕私人援引推薦；在臺灣省行政長官任內，徵用日本籍的官員，又廣攬臺灣本地人才，但雖推行地方自治，卻堅持臺灣民眾直接選舉為時尚早，以免危及國民黨的統治，最終導致自己孤立。小谷豪志郎著，陳鵬仁譯之《蔣經國先生傳》，評價蔣經

¹¹ 大俠·道卡斯（薛雲峰），〈「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丘逢甲與吳湯興〉，收於許維德主編，《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頁249-287；徐博東、黃志平〈乙未武裝反割臺義軍統領吳湯興、徐驥、邱國霖大陸祖籍考〉，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下）－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2019），頁792-803；陳怡宏，〈戰爭的再現：1895年乙未之役駐守臺南時期劉永福抗日形象〉，《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8（2019.11），頁69-128。

¹² 蔡承豪，〈精明強幹，任事實心－蔣元樞任官之評〉，《故宮文物月刊》440（2019.11），頁16-26；王靜儀，〈臺北設府與首任臺北知府林達泉在臺事蹟研究〉，《臺北文獻（直字）》210（2019.12），頁99-121；郭佳玲，〈陳星聚與清末北臺灣開發之研究〉，《臺北文獻（直字）》210（2019.12），頁123-144；蘇淑芬，〈清領時期彰化縣知縣高鴻飛事蹟探討〉，《臺灣文獻》70：4（2019.12），頁45-75。

¹³ 王明燦，〈王得祿從軍－擢陞提鎮統師緝捕海盜（1806-1808）〉，《嘉義研究》19（2018.9），頁195-248；賴玉玲，〈總鎮一方：臺灣鎮總兵堅勇巴圖魯曾元福〉，《故宮文物月刊》429（2018.12），頁88-95。

國為「忠孝兩全名留青史的非凡領導者」，以外國人的角度評論蔣經國，並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提供的資料撰寫，惜對於蔣經國任職總政治部主任時與臺灣白色恐怖案件的關係並未有所著墨，且此書日文版早在 1990 年已出版，並未運用目前受到高度注目的蔣經國日記。¹⁴

再者，沈昌煥（1913—1998）曾任蔣中正英文祕書、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兩度出任外交部長以及總統府祕書長等職，因主導中華民國外交系統近 30 年，有「外交教父」之稱，中國近代史學會於 2018 年辦理「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 20 周年研討會」。隔年出版《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 20 周年研討會實錄》，集結蕭明禮、陳立文等八位學者，論述其於權力核心中於政治與外交的具體貢獻，其中陳立文〈蔣中正日記中的沈昌煥〉從蔣日記論述在諸多國際事務處理中他對沈的信賴關係。

軍人部分，王立楨《我以我血獻青天：十三位國軍飛行員的故事》，是其所著飛行員的故事系列第 4 輯，所收錄的十三位飛行員，有的不幸失事捐軀，有的幸運死裡逃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是 1970 年代知名影星秦漢的哥哥孫祥輝少校，1967 年 12 月 25 日，他在臺灣海峽上空進行「零 G 脫離戰術」任務時，因飛機失事跳傘失敗而喪生，事後其父僅以毛筆寫下「死得乾淨」四字做為弔念。¹⁵

3. 非國民黨政治人物：林翊茹〈高玉樹與臺北市—以競選與市政建設為中心（1951-1972）〉，以非國民黨籍，但政途順遂的高玉樹為研究對象，回顧他五次競選與兩度當選臺北市長（1954、1964），到成為第一屆省轄市官派市長的過程，還有與執政高層、國民黨部的斡旋與溝通，以及對市政的規劃，結論指出高玉樹進入政治體系後，不得不聽命於上級的指示，進而被馴化，逐漸走上一條不可能與中央衝撞的道路。阮愛惠主編之《大時代的故事：臺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細數余登發擔任橋頭鄉長、國大代表、高雄縣長，到捲入吳泰安匪諜案的政治歷程，惜全書僅整理前人著作，未使用一手史料，後半在描述美麗島事件、民進黨組黨、桃園機場事件時，主角余登發甚至消失不見。陳郁秀《盧修一與他的時代》，詳述盧修一（1941-1998）的一生，包括其原為忠黨青年，直到留學歐洲時赴美打工，才動搖其國家觀念，還有擔任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時被警總拘捕、連任三屆立法委員，最後抱病替臺北縣長參選人蘇貞昌真情一跪等事蹟。黃增添《廉能政治的實踐家：陳定南傳》，描述陳定南（1943-2006）在兩任宜蘭縣長任內，注重環保反六輕，成功開創宜蘭經驗，及其擔任立法委員時擇善固執與法務部長時打擊黑金的表現。¹⁶

陳儀深〈戰後台灣「外省」菁英的台獨主張—從雷震到張忠棟的類型分析〉打破本省人主張臺獨的刻板印象，整理戰後外省菁英臺獨主張之類型，其中雷震、殷海光屬自由主義，雷震曾提出「中華臺灣民主國」解決兩岸的定位問題，而殷海光基於對國民黨失望，對統獨立場雖僅私底下與謝聰敏交談時吐露，但已推演至接受臺灣民族主義的態度。另外，外交家楊西崑曾在 1971 臺灣退出聯合國主張改國號、立新憲以追求政府之存在，而臺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與時

¹⁴ 賀淵，〈陳儀在閩臺兩地的人事行政實踐及其思考〉，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上）—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2019），頁 53-73；小谷豪志郎著，陳鵬仁譯之《蔣經國先生傳》（臺北：蘭臺，2018）。

¹⁵ 王立楨，《我以我血獻青天：十三位國軍飛行員的故事》（臺北：遠流，2018）。

¹⁶ 林翊茹，〈高玉樹與臺北市—以競選與市政建設為中心（1951-1972）〉（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阮愛惠主編，《大時代的故事：臺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臺北：前衛，2019）；陳郁秀編著，《盧修一與他的時代》（臺北：白鸞鸞文教基金會、遠流，2018）；黃增添編寫，《廉能政治的實踐家：陳定南傳》（臺北：主流出版有限公司，2018）。

俱進，在 1989 年鄭南榕自焚以後轉向，替葉菊蘭的臺獨主張辯護。薛化元〈1950 年代《雷震日記》中的「反對黨」與胡適——一個數位人文的分析〉則以《雷震日記》為文本，探討胡適在 1950 年代臺灣反對黨運動中的角色及歷史定位。統計 1950-1960 年的《雷震日記》中，人名（非家屬）辭頻提及最多的就是胡適（超過 1,300 次），其次再計算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的人名篇數（天數），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依然是最多者（134 天）。而 1957 年為《自由中國》議題轉折之關鍵年代，再針對 1957 到 1960 年的《雷震日記》進行數位探勘，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仍是最多者（96 天）。胡適在外省籍菁英的角色始終舉足輕重，但他不願參加在臺組織的反對黨，更遑論擔任領袖，這也說明臺灣反對黨運動的發展中，胡適只能扮演雷震案爆發聲援或援助的歷史角色。¹⁷

4. 政治受難與政治運動者：黃惠君《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在林連宗外孫廖英豪等家屬提供協助下，細數林連宗（1904-1947）從出生八卦山下的彰化，到留學日本中央大學、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與行政科考試、執業律師、戰後當選臺灣省參議員與制憲國大代表，最後遭陳儀下令密捕、密裁的一生經歷。蕭道應（1916-2002）出身屏東佳冬地主，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與妻黃素貞等人共赴中國參加抗戰，1949 年回臺擔任臺大醫學院法醫室主任，加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後因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而逃亡，躲藏於三義魚藤坪基地，1952 年與陳福星等人「自新」。《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由黃素貞及藍博洲所撰寫，書名「悲劇演員」譬喻其一生是悲劇時代的悲劇演員，非指其為演員。而史料運用中，由黃素貞的親筆回憶錄雖珍貴，二位作者僅述及蕭氏被捕為止，有關日後自新的生活以及身為法醫牽涉到武漢大旅社冤案隻字未提。龔昭勳《死亡行軍：從神童到火燒島叛亂犯：蘇友鵬醫師的一生》，描寫出生於臺南名門，一路攻讀臺南二中、臺北帝大預科與醫科，畢業後在臺大醫院擔任耳鼻喉科的蘇友鵬（1926-2017）醫師，1950 年因無端捲進「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在綠島感訓十年的一生遭遇。黃龍興〈莫逆與分歧——政治受難者陳中統與陳映真的生命圖像〉，敘述陳中統與陳映真為初中同學，1957 年 4 月 24 日因「劉自然事件」，而一同出面抗議，1960 年代末同樣因叛亂案而入獄，但兩人各自選擇不同的反抗道路，陳中統是臺獨，陳映真為左統，但不同的政治立場，從不影響兩人的友情。¹⁸

雷震與《自由中國》之相關議題，近兩年的研究成果頗豐。薛化元《雷震與 1950 年代臺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指出國民黨當局處理雷震案有適法性的問題，包括雷震被捕時遭違法拘提、提審權被剝奪、劉子英的自白不具證據力、交付軍事審判有爭議等等。其次論及雷震案的歷史意義，認為該案是國民黨當局一連串打壓自由民主言論的結果，以警備總部組成專案的時間點來看，與《自由中國》針對蔣介石三連任提出相關建言頗為相近，再以警備總部準備逮捕雷震的相關作業來看，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時序上密切相關。再者，關於決策者的角色與責任，直言時任總統的蔣介石參與甚深，不僅頻頻召集各黨政高層

¹⁷ 陳儀深，〈戰後台灣「外省」菁英的台獨主張——從雷震到張忠棟的類型分析〉，《文史臺灣學報》12（2018.09），頁 81-104；薛化元，〈1950 年代《雷震日記》中的「反對黨」與胡適——一個數位人文的分析〉，《東亞觀念史集刊》15（2019.12），頁 45-82。

¹⁸ 黃惠君，《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臺北：臺北市府文化局，2019）；黃素貞、藍博洲，《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臺北：人間，2019）；黃秀華，《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臺北：前衛，2017）；龔昭勳，《死亡行軍：從神童到火燒島叛亂犯：蘇友鵬醫師的一生》（臺北：前衛，2018）；黃龍興，〈莫逆與分歧——政治受難者陳中統與陳映真的生命圖像〉，《臺灣風物》68：1（2018.3），頁 139-174。

瞭解進度，更親自下達指令，為雷震案的處置最核心的關鍵人物。最後，以解嚴後雷震案的平反過程做為全書的結尾。

薛化元、江子揚〈轉型正義的數位人文嘗試：以傅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文章為例〉，以傅正（1927-1991）發表在《自由中國》，且內容涉及黨產的文章為文本，針對黨產相關詞彙，進行詞頻量數偵測，發現救國團（出現 50 次）、勞軍（出現 40 次）、軍友社（出現 29 次）、黨報（出現 20 次），進而指出傅正無論在題目擬定或內文撰寫均未使用「黨產」之詞彙，而是透過黨產來源、黨產用途以及附隨組織等方面進行論述。其次，1958-1959 年間，傅正所討論者主要集中在救國團、黨報、軍友社，1960 年黨營事業、黨庫、國庫開始出現在文章討論內容，可見傅正針對黨產議題時，如同剝洋蔥般由遠而近、由外而內、由周邊附隨組織再到國民黨中心進行寫作。¹⁹

此外，王智明編之《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收錄多篇林孝信（1944-2015）受訪的訪問紀錄與他人對林孝信的追思文章，以呈現其半世紀投身社會改造運動的歷程。而陳婉真《街頭與牢籠之間—臺灣民主化的無名英雄》，特別注意近 70 年受政治氛圍影響，刻意被遺忘的二戰臺籍老兵、白色恐怖受難者、黑名單及被主流政客視為社會邊緣人等，分「二二八」、「走街頭」及「跑海外」羅列 50 餘位人士。²⁰

（四）經濟人物

1. 財經官員：嚴家淦（1905-1993）曾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臺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長、總統等要職，對於經濟政策的擬定扮演重要角色。高瑞仁〈嚴家淦與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細數嚴家淦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例如首度擔任財政部長期間建立中央總預算制度、協助推動土地改革；二度擔任財政部長時，取消繁複的匯率管制措施，並制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與推動「獎勵投資條例」立法通過，使臺灣成為有利投資和出口的環境；任職閣揆時，設立加工出口區，延攬知名經濟學者回臺擬定經濟發展政策、進行賦稅改革。連俊杰〈嚴家淦與美援運用委員會(1948-1963)〉，則聚焦於他任職財政部長並兼美援會職務期間，合理、合法地向美方爭取美援，並配合美援會推行財經改革，包括鼓勵儲蓄、建立中央銀行制度、改進預算制度、推行績效預算及統一匯率，為後來臺灣的金融體制確定大致的架構。²¹

2. 水利：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一書，介紹來自日本的八田與一和來自中國的徐世大（1895-1974）兩位水利官員。該書第三章〈施展抱負：八田與一及其在臺灣的水利試驗〉，強調除嘉南大圳外，桃園大圳、土地改良等都是和八田有密切關係的水利遺產，而以「技術官僚的典範」來評價八田應最為貼切。第四章〈有志難伸：徐世大中國水利

¹⁹ 薛化元《雷震與 1950 年代臺灣政治發展 - 轉型正義的視角》（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薛化元、江子揚〈轉型正義的數位人文嘗試：以傅正在《自由中國》有關黨產議題文章為例〉，《黨產研究》5（2020.4），頁 175-201。

²⁰ 王智明編，《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北：聯經，2019）；陳婉真，《街頭與牢籠之間—臺灣民主化的無名英雄》（彰化縣：財團法人綠色臺灣文教基金會，2019）。

²¹ 高瑞仁，〈嚴家淦與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碩士論文，2018）；連俊杰，〈嚴家淦與美援運用委員會(1948-1963)〉（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

經驗的在臺實踐)，敘述徐世大來臺前曾參與中國華北治水、河港等重大工程，來臺初期以戰後的水利設施復原為主，雖後來有機會參與石門水庫的規畫建造，但由於臺灣多是規模小的埤圳或溝渠，他在中國治大水的經驗始終在臺難以施展。凌嘉懋〈日治時期地方菁英與水利事業－以張麗俊作為探討對象〉，以曾任葫蘆墩下南坑第一保保正、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的張麗俊（1868-1941）為主角，研究其如何主導八寶圳大路缺支線之堤防創設、協助開造營林所之貯木池、成功募集在放屎溝圳上造築永久堰堤的資金，並協調製紙會社引起的用水糾紛。²²

3. 漁業：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出版之《臺灣早期漁業人物誌》，收錄海洋漁業、養殖漁業、漁政單位、海洋院校、水產試驗所、漁民組織等領域，已過世先輩的傳記共 30 篇，其中包含推廣漁業不遺餘力的楊基銓（1918-2004），惜可能因為資料不足，偏向生平事蹟的概略介紹，對其擔任臺灣省農林廳水產科科長與經濟部臺灣漁業增產委員會專門委員的任內事蹟，未能多加著墨。²³

（五）跨域流動人物

跨域流動是近年臺灣史研究者極為關注的議題，亦反映在人物研究。

1. 清代來臺的外國人：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著、徐雨村譯的《福爾摩沙的洋人家族：希士頓的故事》，記載英國人希士頓（Robert John Hastings，1842-1912）於 1869 年來到安平，擔任大清海關的鈴字手，與商人女兒黃允官結婚後轉而經商，因乙未割臺其家族事業受波及，於 1916 年全家離臺不再復返，希士頓家族見證洋人在南臺灣的足跡及生活樣貌。²⁴

2. 赴中國的臺灣人：廖振富主編之《被遺忘的臺灣人：林子瑾、吳子瑜、吳燕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多篇與林子瑾（1878-1956）、吳子瑜（1885-1951）、吳燕生（1915-1976）相關的論文。²⁵ 其中李毓嵐〈林子瑾的人脈網絡與實業經營〉一文，指出 1912 年即回復中華民國國籍，1924 年在北京成立「北方長途汽車行」的林子瑾，為最早到中國發展的臺商，並推測他過去在政治立場上的矛盾，例如既是「臺灣文化協會」的評議員，又參與辜顯榮籌組之「公益會」，可能是因身為實業家，必須多方交好，以利於自己的事業。李知灝〈林子瑾的「民族想像」：以詩文、譯作為研究中心〉，提及林子瑾對中國歷史存有懷想，又透過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希望臺灣能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以附敵的罪名加諸臺灣人，讓他感到憂心。吳宗曄〈林子瑾在臺文化活動：以臺灣文社的經營與其譯作《德國史略》為研究中心〉，旨在說明林子瑾除是臺灣文社的創社理事外，更提供瑾園作為臺灣文社的事務所，促使瑾園成為當時臺灣傳統與現代文明知識匯聚與流通的場域，其轉譯西方列

²² 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頁 71-118；凌嘉懋，〈日治時期地方菁英與水利事業－以張麗俊作為探討對象〉（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

²³ 王月霜等撰稿，《臺灣早期漁業人物誌》（臺北：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2019）。

²⁴ 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著、徐雨村譯，《福爾摩沙的洋人家族：希士頓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9）。

²⁵ 廖振富主編，《被遺忘的臺灣人：林子瑾、吳子瑜、吳燕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陽文史研究學會、臺灣文學館，2018）。

強的歷史，使臺灣傳統知識分子可迅速理解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並反思自身處境。至於林子瑾的表弟吳子瑜與吳子瑜的女兒吳燕生，吳佳育〈吳子瑜、吳燕生父女生平事蹟考述〉，考察吳子瑜的活動範圍，參與之商業、社會與藝文活動，並述及吳燕生的婚姻（嫁與蔡伯毅之子蔡漢威）與活躍於詩壇的情形。施懿琳〈女解經書亦紹裘：吳燕生的文化養成與漢詩書寫—以 1930-1937 年為範圍〉，主要從經濟與文化資本兩角度進行探索，分析吳燕生如何快速崛起於 1930 年代臺灣漢詩壇，主因是她出身富豪世家，其父為她經營的人脈網絡，形構成堅實的支撐力量。

許雪姬〈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解明過去研究無法完整且深入敘述在中國漢口的臺灣人動向。文章中掌握多項原始史料，如臺灣總督府核發的旅券下付表、漢口市警局及臺灣旅漢同鄉會製作的名單、淪陷後的《武漢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相關審判資料，再輔以兩位關鍵人物莊泗川、柯台山的訪問紀錄，歸納出臺人赴漢口以求職、經商者居多，而在 1938 年 10 月日軍佔領漢口之後，臺人停留者才漸多，約 400 餘人中以代表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四大權威者的蔡文石、賴春貴、柯大樹及莊泗川最知名。戰後他們面臨漢奸及戰犯之審判，莊泗川最先被捕也最先獲釋，蔡文石因罪嫌不成立而處「不起訴」，柯大判刑 7 年棄保匿跡、賴春貴終獲判無罪，而其他判無罪者是否牽涉到賄賂，尚值得深究。

此外，張泉〈臺灣日據期精英的跨域流動與地方／世界的新視域—以新竹風雲人物謝介石為中心〉，採取設身處地的立場或視角，以宏觀維度考察謝介石（1878-1954），認為若引入臺灣／滿洲國／新中國三種殖民模式的共時殖民政體差異維度，他不宜簡單化地冠以漢奸；綜觀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也很難說他一定就是勤王，或者一定就是叛國。反之，徐康《臺籍革命伉儷》介紹 20 對從事革命的臺籍夫婦，包括謝雪紅與楊克煌、李友邦與嚴秀峰、謝南光與嚴恩綺、林正亨與沈毅等等，全書以中國民族主義史觀書寫，意識形態濃厚。再者，李根培《世間何處是桃源—李應章（李偉光）研究【上卷】日治時期：臺灣二林蔗農事件》、《世間何處是桃源—李應章（李偉光）研究【下卷】戰後上海：臺灣旅滬同鄉會》，介紹二林蔗農事件主角李應章（1897-1954）之生平，尤其下冊著墨蔗農事件被判刑後，他赴中國廈門於鼓浪嶼開設「神州醫院」，再赴上海法租界開設「偉光醫院」，改名李偉光，參與成立「臺灣旅滬同鄉會」。作者為李應章侄孫，費時十幾年研究其行述，走訪廈門、上海及北京等地，稱李應章為「歷盡滄桑五朝民」。²⁶

3. 來臺的日本人：教育部分有木下知威編《伊沢修二と台湾》，試圖從日本、臺灣，乃至亞洲的角度處理日人伊澤修二（1851-1917）身為教育家的一生貢獻，分兩大部分探討，第一部分收錄與伊澤修二相關的先行研究，綜合性地檢視伊澤修二在各領域之成就；第二部份收錄 5 篇不同領域的論文，主題有：口吃矯正、盲啞教育、乃木希典遺髮碑的建立計畫、臺語教育、中文教育，以及伊澤修二逝世後的紀念表揚活動。其次，許瓊丰〈一位臺中州公學校日本教師的生活軌跡—加藤虎太郎的《自畫像》〉，研究加藤虎太郎（1894-?）自 1914 年來臺長達 20 年的生活，由擔任公學校教師及《臺中州教育》編輯生涯，可見臺中州重視

²⁶ 許雪姬，〈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26：1（2019.3），頁 113-164；張泉，〈臺灣日據期精英的跨域流動與地方／世界的新視域—以新竹風雲人物謝介石為中心〉，收入陳惠齡主編，《竹塹風華再現—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7-195；徐康《臺籍革命伉儷》（臺北：華品文創，2018）；李根培，〈世間何處是桃源：李應章（李偉光）研究【上卷】日治時期—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9）；李根培，〈世間何處是桃源：李應章（李偉光）研究【下卷】戰後上海—臺灣旅滬同鄉會〉（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9）。

兒童個體創造力的教育，及皇民化時期教育報國的實況，該文凸顯日籍教師對臺灣教育的觀察視角。²⁷

學術部分，歐素瑛〈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敘述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實互為上、下級學校，藉者渡邊惠鎧（1894-1978）的個案研究，突顯兩校知識及人事交流面向，1926年他擔任臺北高校教授，進行植物精油的化學研究，並同時與臺北帝大化學教授合作研究工作，迄1941年始兼任臺北帝大講師，負責講授有機化學特論，1944年轉任該校教授，仍兼任臺北高校教授，迄1948年返回日本，他對臺灣的天然物化學研究及教學有重要的地位。蔡思薇〈植物知識、保存與流轉：兼論金平亮三與威理森的臺灣記憶〉，敘述對臺灣林業學術貢獻非凡的金平亮三（1882-1948），與受雇於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的植物學者威理森（1876-1930），1918年威理森在臺的幾次登山，多由金平隨行，為彼此人生留下難忘的印記。如威理森採集烏來杜鵑，命名為「金平杜鵑」，1928年金平離臺返日時，特寄自己與烏來杜鵑合影的照片給威理森，此植物居然在1970年代因翡翠水庫興建而滅絕。²⁸

政治方面，佐野靜代撰文，許瓊丰譯、長谷部茂審定〈關於西鄉菊次郎經歷的再探討—橫濱、美國、臺灣、京都〉，則解答了西鄉隆盛長子西鄉菊次郎（1861-1928）一生中不同階段的經歷，尤以在宜蘭廳長任內的事蹟最值得關注。林丁國〈內海忠司在高雄州的治理與休閒（1935-1939）〉，指出1935至1939年擔任高雄州知事的內海忠司（1884-1968），任內提出「高雄工業地帶建設」的構想，將高雄航空隊遷移出高雄港，奠下高雄工業區及高雄港成為國際大港的基礎，另述及當時的料亭政治與內海從事的觀看棒球、打高爾夫球等休閒活動。²⁹

林祐里〈「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文中主角川平朝清的祖父川平朝彬與琉球國王第二尚氏具有血緣關係，亦曾任王朝官職，琉球王國滅亡後，川平家族輾轉遷移至東京、沖繩、臺灣等地。川平朝清出生於臺中，曾就讀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日本投降後全家被遣返回沖繩，其後他在沖繩成立戰後第一個對民眾廣播的電臺，並成為戰後沖繩放送首位播音員。楊護源〈日治時期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與戰後臺灣軍事接收〉，敘述安藤利吉（1884-1946）來臺擔任末代臺灣總督，於戰後時服從天皇的命令，強力壓制日軍對戰敗的不滿，防止軍隊暴動，積極向中、美雙方爭取在臺日軍的權益，使在臺日軍順利遣返、國府軍事佔領順利交接等正面意義。³⁰

4. 來臺的中國人：黃賢強〈未竟之實業救國：黃強將軍在南洋和臺灣的考察〉，敘述長期追隨陳炯明的職業軍人黃強，在陳炯明反孫中山行動失敗後，認真考慮新的出路，而於1926年至馬來半島和臺灣進行實業考察。在馬來亞他特別關注當地農業、礦業的發展；在臺灣多

²⁷ 木下知威編，《伊沢修二と台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許瓊丰，〈一位臺中州公學校日本教師的生活軌跡：加藤虎太郎的《自畫像》〉，《臺灣風物》69：1（2019.3），頁65-104。

²⁸ 歐素瑛，〈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臺灣文獻》69：4（2018.12），頁249-276；蔡思薇，〈植物知識、保存與流轉：兼論金平亮三與威理森的臺灣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7（2019.5），頁179-198。

²⁹ 佐野靜代著、許瓊丰譯，〈關於西鄉菊次郎經歷的再探討：橫濱、美國、臺灣、京都〉，《宜蘭文獻雜誌》117（2019.3），頁4-57；林丁國，〈內海忠司在高雄州的治理與休閒（1935-1939）〉，《嘉大應用歷史學報》3（2018.2），頁91-117。

³⁰ 林祐里，〈「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楊護源，〈日治時期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與戰後臺灣軍事接收〉，《臺北文獻（直字）》210（2019.12），頁123-144。

考察農業和林業，以及經濟商品的生產和營銷管理，並對日治臺灣的諸多成就表示讚賞。³¹

5. 在日本的臺灣人：野島剛《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介紹在日本發展的臺灣人，涵蓋政治、文壇、藝術、飲食等不同領域，包括蓮舫、辜寬敏、翁倩玉、安藤百福、邱永漢等人。在蓮舫的部分，特別提及她的祖母是陳杏村（1909-1977），為時裝設計師，1940年前往上海經商，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戰後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嫌逮捕，又被改成戰爭犯罪，最後無罪定讞，之後成為臺灣地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³²

（六）社會領導階層與地方菁英

關於具有全臺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社會領導階層，黃富三〈林獻堂 vs. 廖文毅—戰後兩位旅日臺人領袖之政治動向〉，深入比較林、廖兩人政治生涯之異同，兩人皆是臺灣菁英，戰後均主張聯省自治，但因牴觸以黨領政的中央集權政治而被迫害，隨後均赴日長留不歸，但林獻堂老死異國後方歸葬故鄉，廖文毅晚年卻在勸歸下返臺。此文另一重點，是依據檔案釐清廖文毅偷渡日本的真相，指出他在香港冒名許錦昌，向兩廣特派員公署領得護照，援用盟總規定訪問在日親友辦法，向盟總申請，於1950年2月8日左右非法進入日本。

地方菁英方面，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一九三〇—一九六〇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以吳新榮（1907-1967）日記為主要史料，分別從看電影、打麻雀、下圍棋這三項娛樂活動，探究殖民地處境下，臺灣人與日本人的交涉多元面向，以及臺灣人的心境，還有臺南府城對於周邊偏鄉僻地的草地人之存在價值。以下圍棋而言，可串起地方人士與在臺日人的社會關係網絡，亦得以讓處於戰時嚴厲管制和精神緊繃下的心靈有所抒發和寄託。

凌春玉〈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第一辯護士—蕭祥安生平事略〉，在新竹畫家蕭如松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其父蕭祥安（1891-1966）事蹟，蕭祥安本為公學校訓導，因不滿臺、日間的不平等待遇，自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取得北埔第一位辯護士資格後於臺北開業，二二八事件後遷回新竹，過著半隱的晚年生活。蘇全福編著之《屏東縣內埔鄉人物傳略》收錄123篇內埔鄉已辭世之有名望人士傳記，其寫作體例如同鄉志人物傳，以個人之力纂修地方史甚為難得，惜全書未附照片。³³

探討地方菁英的相關學位論文亦不少，鍾承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與知識傳播—以張麗俊與黃旺成為例〉，使用張麗俊（1868-1941）與黃旺成（1888-1979）的日記為文本，研究臺灣的知識分子在日本統治下如何經營家庭生活與從事何種休閒娛樂，並探討其教育背景與其如何將所具有的知識傳達給社會大眾。彭詩庭〈日治時期臺灣仕紳的家庭教養與親子關係—以日記為中心的觀察〉，以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吳新榮為討論對象，研究前述諸人日記中所呈現的教養與親子關係，並運用教育學理論分析不同的教養類型。李偉

³¹ 黃賢強，〈未竟之實業救國：黃強將軍在南洋和臺灣的考察〉，收入《近代臺灣與東南亞》論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主編，《近代臺灣與東南亞》（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9），頁259-272。

³² 野島剛著、林琪禎譯，《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臺北：游擊文化，2019）。

³³ 黃富三，〈林獻堂 vs. 廖文毅—戰後兩位旅日臺人領袖之政治動向〉，《臺灣風物》69：4（2019.12），頁29-94；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一九三〇—一九六〇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臺北：蔚藍文化，2019）；凌春玉，〈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第一辯護士：蕭祥安生平事略〉，《新竹文獻》70（2019.4），頁113-134；蘇全福編著，《屏東縣內埔鄉人物傳略》（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18）。

呈〈建醮活動與地方社會—以草屯聯合里醮典為例〉，提及黃春帆（1870-1951）倡議修築龍泉圳，完工後使草屯土城平原一帶土地得以灌溉，地方上對其頗為感念，乃衍伸出聯合里三獻醮典與黃春帆個人銅像的建立。趙羿巽〈林爾嘉的政經世界與身後形象（1875-2019）〉，指出在政治上，林爾嘉面對不同政權均採不輕易交惡態度，但因 20 世紀前半葉中國政局更迭過於快速，導致他無法與單一統治者建立穩定關係，而逐漸退出政治舞臺；經濟上，建立了跨國境商業網絡，並將事業往近代化跨足，但因中國局勢過於動盪，導致經營的事業紛紛倒閉；在形象上，他橫跨兩岸的生命經驗，因臺灣與中國的政治需求不斷遭挪用，讓他產生許多不同的形象。³⁴

（七）女性研究

劉基安〈林爽文事件下的烈女劉滿姑〉，解析少女劉滿姑於林爽文事件的角色及形象演變，她 17 歲時跟隨父親劉亨基自湖南赴任臺灣，遇林爽文事件而遭亂民所殺，因臨死前罵賊殉難之事蹟，而受旌表成為正義凜然的烈女。作者在此研究基礎下，延伸研究〈《彰化縣志》所見林爽文事件中的節烈女性〉，探討劉滿姑之外的曾明彰妻曾賴氏、楊聯盛妻楊顏氏及江和娘，使女性事蹟不至於被埋沒。劉芳羽〈傳統與現代間的臺灣士紳家庭婦女—楊水心之個案研究〉，以楊水心（1882-1957）與其夫林獻堂的日記為主要史料，梳理楊水心在家庭中的角色、餘暇生活、參與婦女團體之情形，並與另兩位霧峰林家的女性陳岑與吳素貞略作比較，進而指出楊水心介於傳統與現代間的特殊性。³⁵

林瓊華〈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臺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旨在糾正由陳芳明形塑與強調的謝雪紅（1901-1970）臺獨形象，文中說明謝雪紅的政治理念從早期臺共政治大綱的左獨（臺灣脫離於日本統治之外），演進為戰後的左統（她與老左派們常交換紅色祖國的動態與訊息）。赴中國後其核心政治理念為民主自治，但在整個中國框架下，若只有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將具有鮮明的獨立性和排他性，這就成為她和中共之間的最大價值衝突。³⁶

橫跨日治至戰後，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尚有北村嘉惠〈試探臺南新化楊罔之生命歷程：20 世紀前期臺灣女性的就學與教育經歷〉，以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勾勒女主人楊罔（1896-1973），藉新化第一位女性教師的求學及就業，重新思考近代教育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面貌，提出 1940 年代臺灣國民學校教育並不普遍，而地區及男女之間的差異也相當明顯。吳桂枝〈跨時代女藝術家：從陳進的「文化身分」談起〉，不認同有「臺灣第一位女畫家」

³⁴ 鍾承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與知識傳播—以張麗俊與黃旺成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彭詩庭〈日治時期臺灣仕紳的家庭教養與親子關係—以日記為中心的觀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李偉呈，〈建醮活動與地方社會—以草屯聯合里醮典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趙羿巽，〈林爾嘉的政經世界與身後形象（1875-201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³⁵ 劉基安，〈林爽文事件下的烈女劉滿姑〉，《故宮文物月刊》421（2018.4），頁 108-115；劉基安，〈《彰化縣志》所見林爽文事件中的節烈女性〉，《故宮文物月刊》445（2020.4），頁 52-60；劉芳羽，〈傳統與現代間的臺灣士紳家庭婦女—楊水心之個案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8）。

³⁶ 林瓊華，〈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臺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文史臺灣學報》12（2018.9），頁 105-129。

之稱的陳進（1907-1998），僅是閩秀女畫家，指出陳進一生的努力創作證明了她女性身分的價值，並以她的畫作和她的生命故事，見證臺灣經歷日治、光復、戒嚴與政黨輪替的跨時代歷史記憶。林巧棠〈以身體演出自由—蔡瑞月與台灣現代舞〉，透過被譽為臺灣現代舞之母的蔡瑞月（1921-2005），論證臺灣現代舞是追求身體自由與解放的歷史。以蔡瑞月的生命史為主軸，探究戰爭、文藝政策和外來強權影響現代舞蹈的發展，而在歷經白色恐怖的受難，蔡瑞月仍堅持舞蹈藝術的獨立價值。津田勤子〈一位「新女性」的夢想與糾葛—以三高女校友陳勤的生命故事與文藝作品為中心（1922-2017）〉，不同於過往關於陳勤的研究，聚焦其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經驗，本文分析其第三高女的學業經驗對生命的影響，以及發表在文藝雜誌《杏》詩作所傳達的精神，既批判社會又同時摸索女性應有的生活方式。³⁷

崔家蓉《淡定自在：美國首任華裔部長的母親—趙朱木蘭博愛、堅毅、定慧的傳奇風華》為企業家族刻意留史的傳記。趙朱木蘭（1930-2007）於戰亂中遷臺，與趙錫成跨越門第結婚，移民美國以「淡定自在」的處世態度，助其夫創立福茂集團，其六位女兒亦邁向成功，長女趙小蘭目前擔任美國聯邦政府運輸部部長。陳文發〈偶然與巧合：晚蟬書店發行人陳星吟的曲折人生〉，敘述陳逸松女兒陳星吟傳奇一生，她自小受環境薰陶愛好閱讀寫作，1969年輔大哲學系畢業，年僅22歲即由其三哥希寬好友劉志雄出資成立晚蟬書店，經營時間極短卻發行極佳的書本，因父親身為黑名單，1972年乃匆匆結束書局赴法留學，1974年轉赴美國與家人團聚。³⁸但陳逸松已出版的二本回憶錄，完全無大房夫人顏緹及陳星吟等六位孩子的存在。³⁹

（八）原住民

1. 日治時期原住民：傅琪貽〈泰雅人樂信·瓦坦的故事—1918-1924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時期〉，旨在說明樂信·瓦坦（即林瑞昌）在全球性流行性感冒肆虐「蕃地」時，受命出任「蕃地公醫」，在大崙崁後山群部落進行醫療服務，由於他是泰雅族人，又是接受現代文明醫學薰陶的神醫，能獲得族人信任，故配合日警在當地施展撫育性鎮壓時，取得不錯的成效。李慧慧〈一個完美女性教育家的形構：角板山 msbtunix 泰雅族 Yayut Blyeh 的墓後故事〉，從發現位於桃園復興區頭角公墓的一塊日文花崗岩墓碑開始，進而探索墓碑主人 Yayut Blyeh（雅猶如貝里雅，1885-1933）的身分。Yayut 是桃園竹頭角社的泰雅族女性，因嫁給任職製腦公司的日人藥劑師中野忠藏而下山，臺灣總督府立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畢業後，擔任新竹

³⁷ 北村嘉惠，〈試探臺南新化楊岡之生命歷程：20世紀前期臺灣女性的就學與教育經歷〉，《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7（2019.5），頁7-32；吳桂枝，〈跨時代女藝術家：從陳進的「文化身分」談起〉，收入陳惠齡主編，《竹塹風華再現—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1-234；林巧棠，〈以身體演出自由：蔡瑞月與台灣現代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津田勤子，〈一位「新女性」的夢想與糾葛：以三高女校友陳勤的生命故事與文藝作品為中心（1922-2017）〉，《臺北文獻（直字）》204（2018.6），頁147-185。關於陳勤的白色恐怖研究，參見林芳微、曹欽榮、陳勤撰，〈陳勤〉，收入周佩蓉編輯，《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書林，2012年），頁297-372。

³⁸ 崔家蓉，《淡定自在：美國首任華裔部長的母親——趙朱木蘭博愛、堅毅、定慧的傳奇風華》（臺北：天下雜誌，2019）；陳文發，〈偶然與巧合：晚蟬書店發行人陳星吟的曲折人生〉，收入周華斌編，《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八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頁97-133。

³⁹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臺北：前衛，1994）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臺北：聯經，2015）。

內橫屏蕃語講習所泰雅語講師，教導日本警察泰雅語及泰雅族人日語，成為日本當局塑造的完美原住民典範，亦是臺灣原住民現代史上少見的女性菁英。巴干·巴萬〈霧社事件遺族的心聲－以莫那·魯道遺族為中心〉，作者為莫那·魯道外曾孫女，主要論點為反駁部分族人認為莫那·魯道的後代僅止於其女兒瑪虹·莫那的說法，她主張由於瑪虹·莫那曾收養張呈妹，故其直系家族一直延續至今。其次，作者認為莫那·魯道之妻巴干·瓦歷斯不可能被莫那·魯道持槍射殺而死，因為此舉違背賽德克族的 Gaya。最後她呼籲政府將莫那·魯道的遺骸歸還家屬。鄭垂莊〈殖民地時代山地英雄形象比較：越南努普與臺灣莫那魯道〉，僅各以一本越南和臺灣的兒童讀物來比較兩人的形象，在資料上嚴重不足，且關於努普（1914-1999）的形象方面，全文從頭到尾一直反覆強調他是越南少數民族巴拿族人，曾用自製的弓箭射殺一個法鬼，跟村人證明法國人也是人，也會流血，後來加入胡伯伯（胡志明）的全國抗法革命，完全接受越南官方所塑造的努普形象，而無任何反思。⁴⁰

2. 戰後原住民：林于庭〈南志信的人際網絡及其政治角色（1946-1949）〉，敘述日治時期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議員的南志信（1886-1958），戰後在公共場所既不隱藏自己的原住民身分，面對政府當局也不過度強調自身的民族性，因此迅速融入以漢人為主的新政府，還能躋身臺灣省政府委員，成為原住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樑。余明旂〈書寫大麻里祭司 Vuvu Gaitjang 的生命史記〉，介紹排灣族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男祭司 Vuvu Gaitjang（卓良光）的生平與成為祭司的過程，由於 Vuvu 同時兼具執行巫師及祭司儀式的雙重身分，打破排灣族私人儀式是由女巫師及公眾儀式是由祭司執行的藩籬；Vuvu 以竹占師的身分跨足巫師與祭司的職司，亦顯示大麻里部落嚴明的階序已漸漸鬆動瓦解，儀式中的性別分工也被打破。⁴¹

（九）宗教人物

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指出曾景來（1902-1977）1928年畢業於駒澤大學，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位大學畢業的佛教學者，他亦是南瀛佛教會的核心份子，曾提出一波波佛教改革的呼聲，批判當時臺灣佛教現況是多有腐敗、僧侶無責任、不禪不淨、無宗無旨；並推動臺灣宗教組織改革，主張創立「臺灣宗教會」，結合儒、釋、道三教。邱敏捷〈李添春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敘述齋教先驅李添春（1899-1988）事蹟，他原在基隆靈泉寺出家，因不習慣寺廟生活而還俗，赴日就讀駒澤大學，回臺任職臺北帝大農經系助教、臺大農學院副教授、教授，其主編佛教刊物，從未間斷與佛教界往來，他認為日本式佛教與臺灣佛教精神背道而馳，對齋教研究及佛教改革思想有其貢獻。⁴²

⁴⁰ 傅琪貽，〈泰雅人樂信·瓦坦的故事 - 1918-1924 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時期〉，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下）- 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19-538；李慧慧，〈一個完美女性教育家的形構：角板山 msbtunix 泰雅族 Yayut Blyeh 的墓後故事〉，《桃園文獻》7（2019.3），頁 47-67；巴干·巴萬，〈霧社事件遺族的心聲 - 以莫那·魯道遺族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18）；鄭垂莊，〈殖民地時代山地英雄形象比較：越南努普與臺灣莫那魯道〉，收入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擴展：臺灣文學 - 第十六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頁 257-273。

⁴¹ 林于庭，〈南志信的人際網絡及其政治角色（1946-1949）〉，《臺灣史學雜誌》27（2019.12）；余明旂，〈書寫大麻里祭司 Vuvu Gaitjang 的生命史記〉，收入李馨慈主編，《排灣學資料彙編第一輯 - 刻畫排灣學：文化的持續與變遷》（屏東：國立屏東大學，2018），頁 177-126。

⁴² 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2（2019.6），頁 1-31；邱敏捷，〈李添

王右軍〈尋找上帝的兒子：梅監務（1865-1940）在中臺灣的傳教歷程〉，敘述英國長老教會梅監務（Campbell. N. Moody）於 1895-1924 年於中臺灣之傳教，他以《談論道理》（TÂM-LŪN TŌ-LÍ）教導基本教義，共成立了 20 間堂會，培養教會自傳人才外，又為自養運動的典範。而潘國明〈被遺忘的帳篷傳教—美國宣教士花翹奇博士（Rev. George Alexander Hudson）在臺灣的宣教事業（1951-1966）〉敘述花翹奇 1951 年來臺，獲基督教長老教會協助，延續其父在中國的「帳棚傳教」，以「福音會幕」佈道方式，巡迴全臺傳教，特別是在澎湖、花蓮等無教會之地成立佈道所，其日間於帳棚內舉辦婦女基督課、幼兒主日學，夜間則舉辦成人「大佈道」，全臺共舉辦 129 場佈道會，吸引聽道民眾達 130 萬人次。作者大量運用口述訪談，勾勒花翹奇在臺之行跡。⁴³

（十）家族史

陳百齡〈探索日治時期新竹市的望族：一個以《新竹市志》人物志為基礎的分析〉，以《新竹市志》與《續修新竹市志》人物志為素材，運用數位方法整理，評估入傳人物所屬之家族。首先，研究團隊中的程式設計師撰寫爬蟲程式，自新竹市文化局網頁擷取人物資料，轉換成試算表格式，並建立「人物」和「家族」兩個工作表。其次，根據紙本，比對登錄在試算表上的網頁人物資料，逐筆找出生卒年代或類別內容不同的內容，再以《市志》為準，填缺漏內容。第三，針對已知的人物，將家族名稱逐筆填入「人物」工作表中的「家族」欄位，也將人物姓名填入「家族」工作表中的「人物」欄位。第四，針對「生年」和「卒年」欄位撰寫函數公式，讓試算表根據人物生卒年代，進行邏輯判斷，並列記人物所屬時期。第五，先按照時代統計人數比例，接著進行人物資料交叉分析。最後，透過人物數量、多樣性和集中度，⁴⁴篩選出浯江鄭家、李錫金、林高庇、林紹賢、蘇賢合、晉江東石滄岑楊氏等六個日治時期新竹望族加以介紹，該研究發現《市志》人物志的人物高度集中於一、兩個家族，這可能是家族努力運作促成，也可能是修史者的因素，而地方人士對於望族既有的印象，可能讓原本家族人物更容易上榜，使得人物數量過於集中。不過，筆者認為這應該也與日治時期人士鑑的編纂，地方街庄協議會與實業家均有具體資料有關。過去家族史研究，多聚焦於特定家族個案或針對少數家族進行比較研究，鮮少以地域社會為範疇進行觀察分析，此篇文章正好彌補此種缺憾。⁴⁵

《竹塹文獻》67期以「新竹區域家族街區的微觀研究」為主題，李啟弘〈新竹李氏家族歷史及源流〉在有限史料下，依據口傳、文物及戶籍資料建構家族史，針對自晉江的來臺路線、渡臺後的遷徙及執業選擇進行合理推測，建構李家來臺二百年的發展。楊婉伶〈清代城

春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高雄文獻》9：1（2019.6），頁 31-53。

⁴³ 王右軍，〈尋找上帝的兒子：梅監務（1865-1940）在中臺灣的傳教歷程〉（中壢：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潘國明，〈被遺忘的帳篷傳教：美國宣教士花翹奇博士（Rev. George Alexander Hudson）在臺灣的宣教事業（1951-1966）〉（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

⁴⁴ 人物多寡表徵家族社會關係資源的高下，當一個家族在《市志》中出現越多的社會傑出人物，則表示這個家族越可能被視為望族；以多樣性為指標，認為當一個家族培養出越多不同類型的人才，則家族在各方面都發揮其影響力；集中度分析是想要知道地方志書中的人物是否集中在某些家族。

⁴⁵ 陳百齡，〈探索日治時期新竹市的望族：一個以《新竹市志》人物志為基礎的分析〉，收入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頁 305-337。

鄉仕紳轉換的範式—以新竹市滿雅吳家與新竹縣貓兒錠曾家為例〉探討移民的生活空間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係，其中滿雅吳家自郊商起家，投資土地致富，光緒年間因子孫析產及出賣土地，轉居鄉間而沒落；反之，貓兒錠楓樹腳曾家原是塹城勞力階級，移居鳳山溪出口地開墾致富，透過購買城中產業、與仕紳階級聯姻、捐納功名成為塹城仕紳。⁴⁶

楊雨晨、陳計生〈從《楊家文錄》看清水楊氏家族的在地化過程〉是以《楊家文錄》為史料基礎，呈現楊家於乾隆年間由福建泉州遷臺，經過幾代人的奮鬥，使其家族成為清水地方望族。在此過程中，他們通過血緣關係與重視讀書、重視經商及重視孝道及大義為家庭傳承，以增強家族之認同，並在滿足自我需求與獲得當地社會認可的雙重交叉下，實現在地化。該篇文章除了有清楚的家族系譜及增加日治時期楊緒洲、楊肇嘉、楊基振及楊基銓的事蹟，大體上內容並未突破楊玉姿於 1986 年發表的〈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發（1760-1890）〉之研究。⁴⁷

鄭正浩《一切都從朱丹灣開始：雲林曲水園鄭家話舊》，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敘述雲林斗六鄭家家族的傳承，考證鄭芳春、鄭沙棠、鄭津梁三代的事蹟，詳述其在清朝、日治時代與戰後不同政權統治下家族命運的起伏，如芳春、沙棠二代身歷清朝與日治公職，而津梁則以《雲林沿革史略》開鄉土研究的先河。中篇述及作者個人在臺灣的求學經歷，下篇敘述作者在東京留學與赴岡山任職的經歷，可見臺、日雙方的學術及民間交流。此書編寫目的在實踐吳三連史料基金會【你・故事・咱・歷史】計畫，以主題進行人物生命史的撰述與紀錄，由你、我、他的故事以串連臺灣的歷史。⁴⁸

學位論文中，江麗娟〈臺灣北部清代擺接堡江璞亭家族的發展〉探討清乾隆年間汀州永定縣高頭鄉的東山房江家 18 世祖江璞亭來臺歷史，由淡水經新莊，最後落腳板橋涵子地區，其後代分居板橋、土城兩地。日治時期部分族人因吸食鴉片，導致家道中衰，所幸 24 世祖江大崑因乙未抗日事件人道救援，得到殖民政府禮遇，並掌握茶葉買賣，成為地方望族。戰後因土地改革家族逐漸沒落，但江璞亭祭祀公業每年定期舉行祭祖，宗親會讓家族得以維繫不墜之地。張添臣〈客家宗族與地方社會—以新竹湖口波羅汶張裕光為例（1825-1904）〉，敘述新竹湖口的張昆和宗族，以 16 世張裕光為宗族崛起的關鍵人物，其於 1841 年進入竹塹城，結識金德美商行後由農轉商，商人和地主身份為其產業累積契機，之後藉由湖口、嘗會與祭祀圈內的人際網絡，擴大影響力。謝泊諭〈臺灣中部地方菁英田中陳紹年之研究〉以陳紹年（1852-1915）為個案研究，探討地方社會菁英於政權轉變下的角色意義，從清末於彰化田中協助官方進行清賦，擔任儒學訓導，募勇團練，維持地方治安；日治初期，參與雲林事件招撫簡義為事業維持的關鍵，擔任參事、街庄區長，參與彰化銀行及臺中中學之設立，並藉創建詩社蘭社，與全臺各地士紳交流，將勢力擴張至臺中、南投等地。⁴⁹

⁴⁶ 李啟弘，〈新竹李氏家族歷史及源流〉，《竹塹文獻雜誌》67（2018.12），頁 7-24；楊婉伶，〈清代城鄉仕紳轉換的範式：以新竹市滿雅吳家與新竹縣貓兒錠曾家為例〉，《竹塹文獻雜誌》67（2018.12），頁 25-32。

⁴⁷ 楊雨晨、陳計生，〈從《楊家文錄》看清水楊氏家族的在地化過程〉，《閩台文化研究》53（2018.3），頁 55-61；楊玉姿，〈清代同發號家族在清水的開發（1760-1890）〉，《高雄師院學報》14（1986.3），頁 71-89。

⁴⁸ 鄭正浩，《一切都從朱丹灣開始：雲林曲水園鄭家話舊》（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8）。

⁴⁹ 江麗娟，〈臺灣北部清代擺接堡江璞亭家族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8）；張添臣，〈客家宗族與地方社會：以新竹湖口波羅汶張裕光為例（1825-1904）〉（新竹：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8）；謝泊諭，〈臺灣中部地方菁英田中陳紹年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三、文化人物研究回顧

2018-2019 年臺灣歷史人物研究成果以文化類為最多量，因此本文特闢一節論述，羅列為學術人物、文人作家、藝術類人物及體育人物共四項。另外，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及國立臺灣美術館「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之系列叢書，雖非史學研究成果，但其彰顯臺灣人物及多元文化特色，亦納入這兩年人物研究成果，將於「檢討與展望」統一分析。

(一) 學術人物

1. 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該館唯一一位館長許壽裳（1883-1948）有兩篇中國學者撰寫的研究論文，一為楊彥杰〈許壽裳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指出許壽裳主持編譯館期間，強調要發揮臺灣的文化優勢，為促進國家學術文化進步服務，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主張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目標是要徹底清除日本殖民統治的餘毒。另一為李細珠〈臺灣光復初期許壽裳若干史實考釋〉，對許壽裳在臺灣的生活史與臺灣省編譯館的人事問題略作拾遺補缺，主要論點是許壽裳之所以願意赴臺，是出於需要一份待遇較好的工作以養家，但他在臺灣的生活並不富裕，常常預支薪資，寅吃卯糧。在編譯館的人事問題上，許壽裳用人並無偏私，重用臺灣人楊雲萍；並且認真甄別，拒聘不少求職者。⁵⁰

2. 大學校長：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利用一批關於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時期與特務機關主事者往返的檔案，推翻過去認為傅斯年在主持臺大校務期間，保護師生免於白色恐怖威脅的看法，⁵¹ 指出傅斯年由於堅決反共，因此積極協助政府肅清匪諜、控制校園秩序，並秘密提供學生在校活動、交友情形等各種情報給特務機關，甚至主動邀請保密局監視臺大醫學院與熱帶醫學研究所，全力協助肅奸。李毓嵐〈中興大學校地擴張時期與臺中頂橋仔地方居民的互動〉，敘述 1967-1972 年劉道元（1902-1996）擔任中興大學校長期間，學校計畫擴充校地，需要收購廣大土地，但收購價格以公告現值為主，並非市價，引起地主群起反彈，有賴劉校長前後召開四次協調會，並與政府高層協商，才得以圓滿解決。王敏銓、冉曉雯《傳奇人生：張俊彥傳》，介紹曾擔任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8 年（1998-2006），同時亦是臺灣半導體界先驅的張俊彥（1937-2018）之傳奇人生，其父張木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使他無法出國就職，但仍成為臺灣首位工學博士（交大工學博士班畢業），獲選中央研究院第 21 屆工程科學組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推動首座國家級半導體中心成立，驅動臺灣 IC 設計產業的發展。⁵²

⁵⁰ 楊彥杰，〈許壽裳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上）- 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8-160；李細珠，〈臺灣光復初期許壽裳若干史實考釋〉，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上）- 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1-192。

⁵¹ 對於此種論述，歐素瑛先前已有所反駁，她指出四六事件時逮捕行動事先徵得傅斯年的同意，由於傅校長支持政府掃蕩行動，使臺大陷入白色恐怖漩渦中。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灣學研究》12（2011.12），頁 17-42。

⁵² 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臺大歷史學報》62（2018.12），頁 213-265；李毓嵐，〈中

劉廣英為張其昀、張鏡湖父子撰寫《俯仰—中華民國政略家張其昀》及《陶然：學者·教育家張鏡湖》。介紹張其昀（1901-1985）身為史學家、地理學家及教育家的成就和理念，政略部分強調他在 1949 年國共內戰之際，主張政府應西遷四川，又以臺灣可泊 10 萬噸級的高雄港，且交通文教發達等條件，建議蔣中正應來臺灣；其後他歷經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並創辦中國文化大學，致力復興中華文化。而其子張鏡湖（1927-2019）為美國克拉克大學地理學博士學位，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微氣候研究所研究員，1959 年獲夏威夷大學聘為副教授，1985 年返臺接任文化大學董事長，將文化大學轉虧為盈，並推展硬體設備及拓展國際學術交流。⁵³ 這二本傳記充滿抗日史觀及黨國思想，以維護中華民國政府正統為最高價值，對於傳主私生活鮮少論及。

3. 學者：翟志成《錢穆的院士之路》，敘述錢穆（1895-1990）的學問成就相當輝煌，院士頭銜已不能增損之，理應當選 1948 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之院士，卻遲至 1968 年的第七屆才當選。翟氏利用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相關資料，推斷 1959 年第三屆院士選舉時，胡適身為院長延攬錢穆為既定策略，大費周章奔走安排，但院士評議會仍發生「跑票」事件，支持錢穆的唯一一票當是胡適所投，此結果亦說明當時中研院學人反傳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對立和衝突。丘宏義的《吳大猷：中國物理學之父》總集吳大猷的研究彙成完整一冊，吳大猷（1907-2000）畢生最大成就在訓練出中國第一批世界級且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其著作《分子光譜》到 1970 年代仍是權威參考書。而在美國發展核子彈「曼哈頓計畫」之前，他的博士論文已研究超鈾元素的電子構造；在臺灣則阻止蔣介石發展核武，改革臺灣科學教育，奠定高科技產業基礎，而本書較獨特是在公領域之外，述及他最不為人知的感情生活。⁵⁴

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第二章〈終身職志：王世慶的清代臺灣農村與水利研究〉，介紹臺灣史研究先驅王世慶（1928-2011）教授，在農村金融與經濟、農村社會與文化、土地制度和水利開發等領域的研究，並總結其研究特點為所有論述都奠定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之上，且從自己最熟悉的土地開始，再慢慢擴及其他地區並進行比較研究。王振鵠（1924-2019）投身臺灣圖書館界達半世紀，是影響臺灣圖書館最深遠的學者，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館長，並於臺師大擔任教職，顧力仁《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將王教授與臺灣圖書館的關係作全面的整理與論述，涵蓋圖書館行政與管理哲學、書目管理、圖書館合作交流等不同層面。⁵⁵

李亦園（1931-2017）在戰後臺灣的人類學發展佔有重要領導角色，他引用心理學與社會學開拓人類學研究領域，身為「臺灣漢人研究」的學者，1950 年代他關注臺灣南島民族，至 1980 年代轉而關注臺灣漢人社會，此外在醫學人類學、宗教人類學都擔任先鋒角色。《臺

興大學校地擴張時期與臺中頂橋仔地方居民的互動》，收入國立中興大學編輯，《2019 年臺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9）；王敏銓、冉曉雯，《傳奇人生：張俊彥傳》（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⁵³ 劉廣英，《俯仰：中華民國政略家張其昀（二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9[2016]）；劉廣英，《陶然：學者·教育家張鏡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8）。

⁵⁴ 翟志成，《錢穆的院士之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3（2019.3），頁 91-126；丘宏義，《吳大猷：中國物理學之父》（臺北：足智文化有限公司，2019）。

⁵⁵ 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頁 49-68；顧力仁《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新北：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2019）。

灣人類學刊》第 16 卷第 2 期（2019 年 2 月出版）為紀念李亦園院士專號，其中張珣〈疾病與文化：李亦園先生對臺灣醫學人類學發展的貢獻〉及劉子愷〈縱橫古今論傳說：李亦園院士的「神話與傳說」研究之回顧〉論其從南島民族研究延伸到漢人社會、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課題，具體展現其跨文化比較、跨學科合作的學術成就。

而向陽等人編撰《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記載莊萬壽（1939-）與好友、同事及同志長期推動臺灣文化土化深耕的記錄。莊萬壽出生鹿港木匠家庭，年少時曾嚮往共產中國，最後乃為臺灣獨立目標奮鬥，他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並創立師大臺灣語文研究所、長榮臺灣研究所。全書分「臺灣文化進路」、莊萬壽的文化教育學術、書寫莊萬壽、書法繪畫共四類，作者達百位之多，編纂目的在建構臺灣主體之文化。另外，卓克華因參與戴炎輝故居之古蹟調查研究，因而書寫〈戴炎輝先生行誼述略及老屋的追憶〉，以通俗筆法分述其家世與生平、事功與學術成就、老屋生活點滴及親友回憶，希冀未來古蹟修復後，可提供大眾瞭解戴炎輝的資料。⁵⁶

（二）文人作家

有「臺灣金石導師」之稱的呂世宜（1784-1855），於道光年間應板橋林氏兄弟林國華與林國芳之聘，擔任林家教席，將金石書法導入臺灣，呂成發的〈論近代金石學宗師—金門書法家呂世宜的文化影響〉深入探討金門人呂世宜寓臺 11 餘年之文風影響。而林豪（1831-1918）亦為跨域發展的文人，他為福建金門人，曾於同治元年至 7 年（1862-1868）來臺，之後於澎湖文石書院講學，晚年南遊新加坡，作品有《東瀛紀事》、《淡水廳志》與訂謬、續纂《金門志》、編纂《澎湖廳志》，文學作品有《誦清堂詩集》，因此甯國平的〈浯江舉人林豪東渡臺陽詩文及行止探究〉及陳家煌的〈論金門詩人林豪來臺任幕賓的境況〉，解析林豪為何來臺，及擔任林占梅遊幕之賓原由及過程，這趟臺灣之行不僅改變了林豪一生，且奠定日後應聘文石書院山長之文化資本，但甯氏依據詩句來編排林豪的行止，在方法上顯有問題。徐惠玲的〈清代林豪《淡水廳志》及其著作〉則探討《淡水廳志》的纂修背景與內容，論述其對臺灣文史的貢獻，徐氏的研究不脫潘是輝對林豪的研究。⁵⁷

陳惠齡主編之《竹塹風華再現—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⁵⁸ 收錄三篇與林占梅（1821-1868）相關之論文。徐慧鈺〈林占梅琴詩探微〉旨在研究林占梅留下的三百餘首琴詩，玩味其從琴韻生活開展出來之琴學詣趣與琴詩意境，以窺其琴詩中清靜高遠之琴境。程玉鳳〈行吟常伴鶴，坐嘯不離琴—林占梅的琴鶴情緣〉，發現林占梅《潛園琴餘草》中，寫琴與鶴相伴的生活詩佔有相當比例，可見他對琴鶴感情之深，當他遇到人事不順，或家遭變故時，琴鶴總是與他形影不離，彼此產生依附（attachment）關係，呈現物我相融、

⁵⁶ 向陽等作，《臺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9）。卓克華，〈戴炎輝先生行誼述略及老屋的追憶〉，《臺北文獻（直字）》210（2019.12），頁 275-310。

⁵⁷ 呂成發，〈論近代金石學宗師：金門書法家呂世宜的文化影響〉，收入陳益源主編，《2018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9），頁 165-175；甯國平，〈浯江舉人林豪東渡臺陽詩文及行止探究〉，收入陳益源主編，前引書，頁 125-163；陳家煌，〈論金門詩人林豪來臺任幕賓的境況〉，前引書；徐惠玲，〈清代林豪《淡水廳志》及其著作〉，《臺北文獻（直字）》210（2019.12），頁 63-97；潘是輝，〈林豪編纂地方志書的理念與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⁵⁸ 陳惠齡主編，《竹塹風華再現—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2019）。

物我相忘的境界。武麗芳〈不器君子護邦家－黃驥雲與林占梅翁婿的儒行探析〉，敘述林占梅岳父黃驥雲（1790-1841）曾以妻為質無懼險阻，親赴粵莊化解閩粵糾紛，且為官清正，鞠躬盡瘁於所司；林占梅因岳父在京為官，得以出入搢紳明儒之門，受到詩書琴畫的藝文薰陶，為日後潛園風華奠下基礎。

前述論文集尚收錄研究張純甫與黃錫祉的文章，游騰達〈論張純甫「消極退守」的文化觀與修養論〉，指出張純甫主張之消極，即進／退這一對反詞組中的「退」字，是「退至現有地位而行吾素者」，亦即「知止」、「安貧」、「反本」、「克己」的修養論。柯榮三〈黃錫祉的族譜文獻及其文藝活動考論〉，爬梳黃氏家族從金門後水頭遷居臺灣新竹的來龍去脈，考證黃錫祉（1790-1841）為金門汶水黃氏派下第十七世裔孫，並論述其參與編寫歌仔冊、漢詩書寫、製謎猜謎等文藝活動的情形，文末指出黃錫祉乃 1930 年代臺灣名氣最響亮的「講古先」。

柯榮三考證清代人物，如〈蔡廷蘭的科舉之路與金廈行跡—道光年間鄉試、會試事蹟考述〉認為「開澎進士」蔡廷蘭（1801-1859）至少參加 5 次鄉試，但並未參加道光 12 年（1832）壬辰恩科鄉試，又舉出他曾參加道光 18 年（1838）戊戌科會試之新證；另一文〈臺灣最後一位進士汪春源江西仕宦事蹟探蹟〉則指出汪春源（1869-1923）自傳中，未提及他在江西仕宦（1905-1909）中曾遭撤委、復委、撤委一波三折的經歷。涂志偉〈開臺進士鄭用錫漳浦祖籍地考〉，亦為考證文章，他藉由漳、臺鄭氏家族族譜以及漳州、金門、新竹三地的調查研究，認為鄭用錫（1788-1858）祖籍應為今漳州市漳浦縣長橋鎮割後村東坑社，其先祖於明清之際從仙遊遷至漳州府漳浦縣，再輾轉遷居金門縣金沙鎮大洋里東溪，渡海移墾於苗栗後壠，鄭用錫 1788 年即出生於此，隔年家族再遷至今新竹市北區世居，可說鄭用錫的祖籍漳州府漳浦縣，也稱為金門人、新竹人。⁵⁹

此外，蘇倉永〈史心與文情—清代臺灣儒者吳子光的史論、文學觀研究〉，指出吳子光的「怨道史論」的特殊性，在於其高舉「設身處地之想」以論史，以「適情達理」還原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其文學觀是欲將史學會通到文學，並主張文以載道、道因文顯，「成一家之言」則是他畢生所追求的境界。劉天怡、鍾書林〈遺民淚難禁，誰慰飄蓬意—林朝崧與乙未前後的臺灣詩壇〉，說明林朝崧（1875-1915）乙未前後的詩作反映了他面對臺灣劇變的內心創傷與痛心疾首，充分展現他內心的民族意識與故國情懷，但相關論述臺灣學者早已提出過。⁶⁰ 林俊宏〈南州詩人張覲廷的古典詩活動及其作品〉，文中主角漢詩人張覲廷（1904-1963）原籍臺南州新營郡安順庄，他在當地設帳教漢學，並創立安順漢文研究會，1930 年代初期南下定居屏東溪州，參與溪山吟社、潮聲吟社等詩社舉辦之詩會活動，多次擔任詞宗，至於其作品則以七言組詩與竹枝詞最具特色。李知灝〈戰後渡臺文人周棄子的遺民想像與文化思維〉，認為 1949 年後來臺，在古典詩壇與現代文壇同享盛名的周棄子（1912-1984），由於家國的淪喪，讓他強調中華民國國體的正統性，進而想像遺留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是希望正統政權解

⁵⁹ 柯榮三，〈蔡廷蘭的科舉之路與金廈行跡：道光年間鄉試、會試事蹟考述〉，收入陳益源主編，《2018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1-97；柯榮三，〈臺灣最後一位進士汪春源江西仕宦事蹟探蹟〉，《臺灣研究集刊》155（2018.2），頁 73-81；涂志偉，〈開臺進士鄭用錫漳浦祖籍地考〉，收入陳益源主編，《2017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2018），頁 307-324。

⁶⁰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

救的遺民，然而隨著時局推演，反攻中興幾無可能，使他強調保國、保天下的必要性，藉由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拒斥共產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也對當時政府箝制言論自由有所批判。⁶¹

客家文學中，交通大學出版社受客家委員會贊助發行「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叢書，2019年出版的《客家文學》為舊文重刊，再略作增刪，人物研究有施正鋒〈戰後吳濁流的認同觀〉以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吳濁流的認同，柳書琴〈跨時代跨語言作家的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舉出這時期龍氏文章的特異性，王惠珍〈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解析龍氏如何與日本文壇建立文學網絡，莫渝〈簡樸與清純：詹冰論〉與吳達芸〈變色龍的性別為何？女詩人杜潘芳格研究〉則分別對詹冰及杜潘芳格不同階段的文學歷程有深入研究。龍瑛宗研究專家王惠珍於2018年再發表〈一緘書簡藏何事：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文壇復出〉，釐清其輟筆三十年後，以中文復出文壇、開創另一個創作高峰之原由。⁶²

岡崎郁子2004年已出版《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2019年中文版問世之目的在重建黃靈芝於臺灣文學史的地位。本名黃天驥（1928-2016）的黃靈芝，在戰後仍堅持以日語創作，除了授勛赴日，一生未離開過臺灣，其作品涵蓋俳句、短歌、詩、小說等領域。呂美親〈破除「語言」的詛咒：論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建構及其史觀〉，談論王育德（1924-1985）認為臺灣文學的「語言主體」應該是臺灣話，所以有必要解決口語和書面語的書寫問題；其史觀的建構即來自臺語研究、臺語文字化、臺灣獨立三位一體而成；但王育德亦提出即便以日文或中文書寫，或是更複雜的語言環境中，只要作者具臺灣意識，使用何種語言書寫，都是臺灣文學。又，王文仁〈想像、凝視與追尋：1960世代臺灣詩人研究集〉，收錄多篇以描述1960世代臺灣詩人創作歷程與文本分析為主軸的論文，研究對象包括須文蔚、嚴忠政、陳大為、羅任玲、羅葉、曾美玲、陳謙、張信吉，前述詩人登上文壇的時間，是在臺灣處於全面變革的1980年代，他們的成長與創作與臺灣解嚴前後的社會互動密切，值得進行深入的探討。⁶³

（三）藝術類人物

1. 音樂人物：研究焦點置於林道生（1934-）和許石（1919-1980）這兩位音樂人。林道生是花蓮重要的音樂教育者和作曲家，常深入原住民部落採集傳統歌謠，並以此為基底，創作室內樂、協奏曲等曲式。同時，他也是少數以人類學式的部落採集，紀錄、保存原住民歌謠的音樂家。姜慧珍《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以生命史的書寫方法，闡釋林道生如何透過自學，踏上音樂之路，並述其創作核心由早前民族精神的反共愛國歌曲，隨現代主義移入後的無調性現代音樂，逐漸轉為中國文化圈下的民族音樂，最後發展出臺灣為主體的愛鄉歌

⁶¹ 蘇倉永，〈史心與文情－清代臺灣儒者吳子光的史論、文學觀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劉天怡、鍾書林〈遺民淚難禁，誰慰飄蓬意－林朝崧與乙未前後的臺灣詩壇〉，《臺灣研究集刊》159（2018.10），頁77-87；林俊宏，〈南州詩人張觀廷的古典詩活動及其作品〉，《屏東文獻》22（2018.12），頁123-151；李知灝，〈戰後渡臺文人周棄子的遺民想像與文化思維〉，《淡江中文學報》39（2018.12），頁211-245。

⁶² 王惠珍，〈一緘書簡藏何事：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文壇復出〉，《臺灣文學學報》33（2018.12），頁29-61。

⁶³ 岡崎郁子著、林雪婷譯，《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呂美親，〈破除「語言」的詛咒：論王育德的臺灣文學建構及其史觀〉，《臺灣學誌》，17（2018.4），頁37-59；王文仁，〈想像、凝視與追尋：1960世代臺灣詩人研究集〉（新北：博揚文化，2018）。

曲。姜慧珍另發表〈林道生的原住民音樂作品創作歷程〉一文，歸納林道生原住民音樂創作歷程為三階段，1984 年任教玉山神學院前，僅有零星聲樂曲和器樂曲作品；1984 至 2002 年，因教學和編寫教材需求，透過原住民學生進入部落採集民歌，使其原住民音樂作品數量達到高峰，並以合唱曲為主；2002 年自教職退休，專注於器樂創作，作品風格形似交響詩，企圖述說一個完整的原住民故事。⁶⁴

許石是〈安平追想曲〉、〈鑼聲若響〉、〈三聲無奈〉等歌曲的作曲者，早年致力於本土歌謠的採集與整理，1950-1960 年代創立大王、太王等唱片公司，發行《臺灣鄉土民謠全集》套裝唱片，舉辦臺灣鄉土民謠演唱會，並創作〈臺灣鄉土交響曲〉，是近代臺灣民間音樂蓬勃發展的關鍵人物。黃裕元、朱英韶《百年追想曲：歌謠大王許石與他的時代》，從許石在臺南的故居開始寫起，詳述其赴日求學、回臺發展音樂事業、籌組「許式中國民謠合唱團」（由許石女兒們組成）之歷程，全書收錄多幅圖片，有基本的註釋，網路影片且附有 QR Code 供讀者掃描，在學術性與大眾史學之間取得良好平衡。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出版之《許石百歲冥誕紀念專刊》，全書圖文並茂，介紹許石對臺灣歌謠的採集、創作與舞台演出，較特別的是該書指出，許石對於原住民歌曲採集亦有濃厚興趣，且與烏來泰雅族少女表演歌舞的場地「清流園山地文化村」建立良好合作關係。⁶⁵

2. 美術人物：臺灣美術史研究搭配展覽論述藝術家生命與作品之關係，如美妍漆藝工坊撰的《詩繪·王清霜：漆藝大師的綺麗人生》、蕭瓊瑞的《真善美聖的實踐者：藍蔭鼎的生命與藝術》，以及郭松年為父親撰寫的《望鄉—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這三本書較之前類似的出版作品，收錄更完整的圖片及藝術評論，值得一提的是郭松年運用父親手稿、日記、信函等史料，書寫其父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及省展風雨等事蹟，書寫不再是「少年」臺展畫家的郭雪湖，在改朝換代後仍全力投入臺灣美術的推展，失望之餘客居日本及旅居美國的心聲。

66

3. 民俗學人物：與臺灣民俗學建構密切的立石鐵臣（1905-1980），有吳曉恬〈民俗、民藝與在地性：日治時期的立石鐵臣研究〉，她認為立石鐵臣灣生的身分致使其產生不同純日人的觀點與創作精神，其作品反映臺灣地方文化與政治勢力的競合關係。而王婷儀的〈柳田國男與日本民俗學〉藉由柳田國男（1875-1962）人生各階段的重要事蹟及建立日本民俗學的過程，以比較研究法去理解臺灣民俗學的成立與否，以及跨國比較研究的可能性。⁶⁷

4. 篆刻與石雕界人物：尾崎秀真以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與記者聞名，葉碧苓的〈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探討其篆刻成就，認為他引介日、臺、清藝術作品，雖不是專業篆刻家，卻為詩書畫印全才，他交遊廣闊且在臺長達四十餘年，提拔臺、日籍印人，可謂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石雕方面則有《刻鑿人生：被遺忘的石雕家族》，敘述大稻埕陳家的廟宇雕刻，自第一代陳根樹、第二代陳萬

⁶⁴ 姜慧珍，《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臺東：財團法人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2018）；姜慧珍，〈林道生的原住民音樂作品創作歷程〉，《臺灣文獻》70：3（2019.9），頁 165-216。

⁶⁵ 黃裕元、朱英韶，《百年追想曲：歌謠大王許石與他的時代》（臺北：蔚藍文化；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徐玟玲等作，《許石百歲冥誕紀念專刊》（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19）。

⁶⁶ 郭松年著；曾巧雲，許倍榕執筆，《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臺北市：馬可李羅文化，2018）。

⁶⁷ 吳曉恬，〈民俗、民藝與在地性：日治時期的立石鐵臣研究〉，收入溫宗翰、洪瑩發、楊玉君主編，《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二）》（臺中市：豐饒文化社，2018），頁 194-217；王婷儀，〈柳田國男與日本民俗學〉，《臺灣風物》69：3（2019），頁 55-96。

全、第三代陳冠雄與陳俊卿兄弟，第四代陳瑤芳，可見工藝家族之傳承，以及石雕技術受現代社會衝擊與保存之道。另一位石雕匠師辛阿救，過去常認為他是祖籍粵東、居住竹南的客家人，蔣若琳考證其為「福建省惠安縣東嶺鎮湖埭頭村」，以艋舺龍山寺中殿的龍柱聞名全臺，〈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石匠辛阿救（1886-1928）和臺灣中部祠廟的互動〉可見他同時承包太多工程及疏於健康管理，1921年於慈濟宮僅工作61天，1928年逝世時工程未完工驗收，該廟石雕自1917到1933年修繕長達16年才完竣，經費短缺、工人工資上漲及匠師拖延等因，致使社會菁英與地方頭人付出不少心力。⁶⁸

5. 戲劇類人物：邱坤良〈張淵福及其臺灣新劇劇本創作的通俗之路〉，敘述1930年代張淵福（1912-2007）身為鐘鳴演劇研究會與鐘聲劇團之編劇，1943年參加臺灣演劇協會「健全演藝腳本」徵選比賽，以《月夜的碼頭》（月夜の波止場）奪得最佳劇本獎，戰後創作廣播及臺語電影劇本，其「電影編劇」的名氣遠超過「新劇編劇」。而顧振輝的〈《臺灣民報》劇作家青釗的生平考〉，考證青釗為出生臺南的黃鑑村（1906-1982），1927年至1932年就讀南京中央大學電機科，以青釗筆名發表劇作〈蕙蘭殘了〉、〈巾幗英雄〉，戰後返臺創辦無線電傳習所及《無線電界》雜誌，開設唱片公司，其劇作家身份少人知，他其實也以紫鵲女士之筆名參與葉榮鐘〈戲曲成立的諸條件〉之相關論爭。⁶⁹

6. 北管戲曲人物：彰化文化局於2018年出版《起鼓傳神：戰火中燃起的北管魂北管藝師鄭夏苗》與《起鼓傳神：五指能操千萬兵 北管布袋戲藝師吳清發》，為藝師留下生命史及表演記錄。鄭夏苗（1936-2019）為集樂軒的第六代館先生，擅長小旦與小生的「細口」，且為榮樂軒及成樂軒共同藝師，其唱腔兼具藝術性、特殊性與地方性。吳清發（1942-）為布袋戲資深演師，精通前後場技藝，二十六歲即擔任主演，五十三歲進入校園傳授布袋戲，其家族戲班「新樂園掌中劇團」延續至今已有四代。二位皆為彰化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又為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及教育部民俗藝術薪傳獎得主。

（四）體育人物

運動類傳記有古錦松的《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团仔—徐生明總教練》的勵志小品，敘述徐生明（1958-2013）的棒球生涯，他在三級棒球時代得到少棒、青少棒與青棒等級別的世界冠軍，更是臺灣具有棒球國手資格而取得國外體育碩士之第一人，他見證臺灣棒球躍上國際舞臺，其生命史更為近50年來棒球發展的縮影。楊玉姿〈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敘述前高雄市長陳啟川（1899-1993）的體育生涯。他是慶應義塾田徑短跑的運動健將，也是三鐵中田徑校隊高手。1918年第一屆慶應競技會以鐵餅獲第一名，1920年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預選會，他為慶應義塾400公尺接力賽代表隊之一，後因故日本未組隊參賽，但仍為最早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拔的臺灣人，且又為五項全能好手。1934年亦是淡水高爾夫球場錦標賽冠軍，唯一列名該球場榮譽會員的臺人，因此日後市長

⁶⁸ 葉碧苓，〈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112（2018.4），頁19-54；黃璟翔、張敦智、阮淑儀，《刻鑿人生：被遺忘的石雕家族》（雲林縣：藏野藝術工作室，2018）；蔣若琳，〈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石匠辛阿救和臺灣中部祠廟的互動〉，《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3/24（2019.4），頁29-67。

⁶⁹ 邱坤良，〈張淵福及其臺灣新戲劇本創作的通俗之路〉，《戲劇學刊》27（2018.1），頁7-29；顧振輝，〈《臺灣民報》劇作家青釗生平考〉，《臺南文獻》15（2019.6），頁140-161。

任內於 1961 年興建高雄高爾夫球場。張永昇〈論臺灣文字媒體對王貞治的形塑（1964-1980 年）〉，旨在研究戰後臺灣三大報如何一步步將旅日球星王貞治塑造成愛國華僑與棒球英雄，並討論他在當時國家外交及宣傳上所扮演之角色，最後再論述王貞治本人對愛國華僑此頭銜之想法，是少數探討國族主義與運動員關係的作品。⁷⁰

此外，由臺灣身體文化協會出版之《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已出版至第十四輯，此輯共收錄 12 位體育人物，涵蓋選手、教練、體育教師等等、包括〈臺灣首位試圖挑戰奧運會的先驅—陳啟川〉、〈足球教練之師—李英生〉、〈雜技拓荒者—吳成琨〉、〈一生奉獻臺灣女子網球運動—劉玉蘭〉、〈國術俠者—傅松南〉、〈「體」壇「操」人—李英生〉、〈點燃奧運聖火的排球運動傳播者—林竹茂〉、〈臺灣排壇儒俠—詹清泉〉、〈臺灣運動賽會之推手—蘇金德〉、〈打造屏東霧臺魯凱族長跑故鄉—杜傳〉、〈默默耕耘的棒球巨人—彭誠浩〉、〈巾幗不讓鬚眉的舞蹈教育家—王玉英〉。值得注意的是，此輯與前述楊玉姿的文章，均提及陳啟川曾參與日本的奧運預選賽，讓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重見天日。大抵而言，此套人物誌，均附有註釋與參考文獻，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替臺灣體育人物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⁷¹

四、檢討與展望

前已述及，2018 至 2019 年共有 186 篇／本臺灣人物與家族史的相關研究作品，本文共分為十四大項予以介紹，各大項與分項的篇數與百分比，可參考表一與表二。

表一：2018-2019 年臺灣人物與家族史研究論著數量與比率表

編號	名稱	篇數	百分比	編號	名稱	篇數	百分比
1	早期與清代人物	7	3.76	9	宗教人物	4	2.15
2	乙未戰爭人物	3	1.61	10	家族史	8	4.30
3	政治人物	24	12.90	11	學術人物	15	8.06
4	經濟人物	6	3.23	12	文人作家	35	18.82
5	跨域流動人物	20	10.75	13	藝術類人物	36	19.35
6	社會領導階層與地方菁英	8	4.30	14	體育類人物	4	2.15
7	女性研究	10	5.38	合計		186	100%
8	原住民	6	3.23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⁷⁰ 古錦松，〈臺灣棒球界允文允武的高雄囡仔：徐生明總教練〉，《高雄文獻》8：1（2018.4），頁 130-150；楊玉姿，〈高雄體育史個案研究：一生熱愛運動的陳啟川先生〉，《高雄文獻》8：1（2018.4），頁 34-55；張永昇〈論臺灣文字媒體對王貞治的形塑（1964-1980 年）〉，《興大歷史學報》33（2019.12），頁 77-118。

⁷¹ 林伯修總編輯，〈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第十四輯〉（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19）。

表二：2018-2019 年臺灣人物與家族史研究論著各分項數量與比率表

細分類次分類	早期與清代人物	乙未戰爭人物	政治人物	經濟人物	跨域流動人物	社會階層領導與地方菁英	女性研究	原住民	宗教人物	家族史	學術人物	文人作家	藝術類人物	體育人物	合計
17世紀人物	2														1.08%
清代人物	5														2.69%
乙未戰爭人物		3													1.61%
清代政治人物			6												3.23%
戰後政治人物			4												2.15%
非國民黨政治人物			6												3.23%
政治受難與政治運動者			8												4.30%
財經官員				2											1.08%
水利				3											1.61%
漁業				1											0.54%
清代來臺的外國人					1										0.54%
赴中國的臺灣人					9										4.84%
來臺日本人					8										4.30%
來臺中國人					1										0.54%
在日本的臺灣人					1										0.54%
臺灣省立編譯館館長											2				1.08%
大學校長											5				2.69%
學者											8				4.30%
文人作家												35			18.82%
音樂人物													4		2.15%
美術人物													23		12.37%
民俗學人物													2		1.08%
篆刻與石雕界													3		1.61%
戲劇類													2		1.08%
北管戲曲													2		1.08%
體育人物														4	2.15%
合計	7	3	24	6	20	8	10	6	4	8	15	35	36	4	186
百分比	3.76%	1.61%	12.90%	3.23%	10.75%	4.30%	5.38%	3.23%	2.15%	4.30%	8.06%	18.82%	19.35%	2.15%	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由表一與表二可知，在十四大類中，以藝術類人物（19.35%）、文人作家（18.82%）、政治人物（12.90%）、跨域流動人物（10.75%）、學術人物（8.06%）佔比較高。其中，政治與學術均為歷史學者向來關注的研究領域，有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自不讓人意外。值得注意的

是，藝術類人物研究獨占鰲頭，若細究其因，舉凡音樂、美術、篆刻與石雕、戲劇都不乏研究成果，這是近年音樂史、美術史等非傳統歷史領域發展迅速的表徵。再者，國立臺灣美術館與國立臺灣文學館之博物館角色定位在收藏、研究和教育三大基本功能，在推廣大眾藝術及文學之餘，其每年定期出版系列叢書即代表研究功能之彰顯。而文人作家類別的蓬勃發展，應是此領域除歷史學者外，亦有不少中國與臺灣文學的研究者投入，其作品以探討特定作家的作品內涵與思想為主，在跨學門的參與下，得以累積較多的成果。

其次，跨域流動人物的研究，亦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中研院臺史所近年積極主辦相關研討會，成功帶動研究風氣，例如每兩年一次，至今已舉辦四次的「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在近兩年的相關作品中，赴中國的臺灣人篇數高達 9 篇，佔總數 4.84%，來臺日本人的篇數也多達 8 篇，佔總數 4.30%，顯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已不限於居住於臺灣的臺灣人本身，也包括臺灣人的海外經驗與在臺灣活動的外籍人士。此外，原住民（3.23%）、體育類（2.15%）佔比雖然不多，但相關作品的浮現，亦提醒研究者這是未來可以積極開發的新領域。

綜觀 2018-2019 年臺灣歷史人物與家族史的相關研究成果，尚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翻案文章的出現

陳翠蓮推翻過去認為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期間捍衛臺大師生的看法，指出他一直與情治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積極協助肅清匪諜；林瓊華挑戰陳芳明替謝雪紅塑造的臺獨形象，說明其政治理念係從早期左獨演進為戰後的左統。

另外柯榮三利用人際網絡互動的詩文集，考證「開澎進士」蔡廷蘭參加多次鄉試之中，並未參加壬辰恩科鄉試，又舉出曾參加戊戌科會試之新證，是屬於小格局的翻案文章。此類深入研究後提出的新論述，改變讀者對歷史人物的既定成見，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新方法的運用

薛化元、江子揚利用詞頻量數偵測，統計傅正發表於《自由中國》與黨產議題相關的文章中，黨產相關詞彙出現的次數，來分析傅正的寫作軌跡；薛化元亦以 1950 至 1960 年《雷震日記》為文本，採用權威詞概念的詞頻分析，並藉由資訊自動化詞頻採計篩選出日記記載有關人名詞彙，其中胡適在《雷震日記》所占的份量最舉足輕重。陳百齡過往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解開新竹皇恩碑人物之間的關係，提示史料分析從「點」到「面」的可能性，⁷²如今又採用數位方法輔助資料蒐集和分析，處理人物數量規模和多樣性、家族集中度和分散度等問題。前述「數位人文」取徑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人員將人文或社會科學問題，轉換成為電腦可以辨識和處理的解決方案，以處理大量歷史資料，以便從整體資料中觀察和解析人文和社會科學問題。

「數位人文」運用在臺灣歷史人物研究上蘊含無限可能性，目前臺師大臺史所張素玢教

⁷² 陳百齡，《石碑背後的家族史：新竹近代社會家族研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5）。

授，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基礎，建置「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進行人物資料檢索、關係網絡分析工具的研發；⁷³ 彰師大歷史所李宗信教授以日記為文本，分析記主人際關係網絡，⁷⁴ 後續研究成果均值得期待。

(三) 多元視角的提出

翁佳音與大俠·道卡斯(薛雲峰)均以長時段為視角，分別觀察 17 世紀以降的東亞海域人物流動與客家人的義民組織，進而發現歷史的長期結構，提出有異於前人的論點，提醒研究者布勞岱爾的長時段分析法，未來仍可運用於臺灣史研究中。

運用外國史料，賦予人物研究的新視野，如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藉清末希士頓家族的興衰，見證高雄與國際接觸的濫觴，並解析該家族與今香港拔萃書院的密切關係。日本研究者用日本、臺灣，乃至亞洲的角度評介伊澤修二，許瓊丰以加藤虎太郎的《自畫像》為史料，不同過往專注臺、日籍的差別待遇，轉以日人視角看待臺灣教育。而謝宗佑在探討林恭事件時，輔以英國外交官史溫侯於 1850 年代訪臺時，與官民接觸的第一手史料，勾勒出林恭所屬的林萬掌家族在南臺灣的地位。在譯文方面，《福爾摩沙的洋人家族：希士頓的故事》以中、英文版面同時呈現，書中人名、地名及機構商號相當多，譯者逐一翻譯外，並在必要處補入解釋，可見其用心仔細。而〈關於西鄉菊次郎經歷的再探討—橫濱、美國、臺灣、京都〉譯者亦在候文及古代地景的翻譯頗為費心。

原住民的自主發聲，如巴干·巴萬以莫那·魯道外曾孫女身份，澄清莫那·魯道後代的延續問題與霧社事件的細節，期待未來有更多原住民從事自身歷史的書寫，而非僅是被書寫的對象。

中國持續關心臺灣人物的研究，但選擇年代以荷治及清代為主，日治時期較少，甚至以政治考量為主不具研究價值，具參考價值的如楊彥杰指出何斌如何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進而成為鄭成功之幕僚，但在歷史評論中，亦將收復臺灣評價為何斌一生最主要的貢獻，的確符合作者身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頭銜。

在既有研究人物中尋求創新題材，如葉碧苓研究尾崎秀真在編輯身份之外的篆刻生涯，呂美親研究政治運動者王育德的臺灣文學論述及史觀，翟志成研究國學大師錢穆何以遲至 1968 年，才當選第七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利用中國及臺灣不同史料對照成果，如顧振輝解析《臺灣民報》劇作家青釗，為出生臺南、留學南京中央大學的黃鑑村、筆名為「紫鴉女士」；柯榮三提出進士汪春源在江西仕宦曾遭遇撤官之波折，但在中國學者汪毅夫為其父出版的自傳中從未提及。

(四) 罕見史料與非文字史料的使用

⁷³ 張素玢，〈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建置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的構想和做法〉，《彰化文獻》22(2018.4)，頁 15-31；張素玢、李宗翰、李毓嵐、李昭容、顧雅文、柯皓仁、謝順宏，〈從 CBDB 到 TBDB：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2(2018.10)，頁 91-115。

⁷⁴ 李宗信、張育誠、劉庭宇，〈獨白一甲子：從地方史的角度解析《劉福才日記》的史料價值〉，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宜蘭縣史館主辦，「第七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臺灣社會」，2018 年 11 月 22 至 23 日。

許雪姬利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之檔案、漢口市警局及臺灣旅漢同鄉會製作的名單、《武漢報》等資料，透過這些多元且罕見的原始史料勾勒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面貌，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陳怡宏以畫報中的圖像和民間的歌仔冊等非文字的史料，研究劉永福的形象，雖然圖像在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早已為人所知，但在臺灣史學界仍較為少見，過去僅蔡秀美利用許丙丁（1900-1977）刊載於《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與《臺灣警察時報》中的漫畫為材料，探許許氏的警察漫畫所呈現的基層警察形象，以究明許氏警察漫畫與其警察生涯之關聯，⁷⁵ 此領域值得持續開發。

（五）日記研究日漸盛行

隨著近一、二十年來臺灣相關人物日記的出土或出版，中研院臺史所每兩年舉辦一次「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的推廣，近兩年日記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陳文松利用吳新榮日記，討論吳新榮看電影、打麻雀、下圍棋的意義；張麗俊日記也可運用在石雕研究；不少碩士生例如劉芳羽、鍾承祐、凌嘉懋、彭詩庭也利用日記資料集中、有資料庫可檢索等特點，以張麗俊、黃旺成等人之日記，做為學位論文的題材。不過，在已出版的日記中，林紀堂、陳岑、陳懷澄、葉盛吉的相關研究偏少，還有不少可以發展的空間。至於 2020 年公開，並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蔣經國日記，還有 2020 年 9 月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開放閱覽的劉永楸（1910-2007）⁷⁶ 日記，亦是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

（六）新研究領域的昌盛

近兩年的臺灣人物研究，焦點已不全然集中於傳統政治、經濟領域，近代作家、藝術、體育等方面的人物研究已卓然有成，特別是「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此兩套系列叢書的介紹詳後）、《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等計畫的成果陸續出版，分別奠定作家、美術家與體育人士未來深入研究的基礎。

臺灣植物自然史也卓然興起。女性研究中，解析女性在生兒育女之外，對社會貢獻尚有寫作、教育、美術及舞蹈等事業，而被選擇研究的對象大多不脫閨秀或名門後代，未來仍有待開發不同職場生涯的女性人物。

至於音樂方面亦有成果，重點置於原住民音樂與臺語歌謠，不過傳唱度頗高的國語流行歌曲音樂人，亦不應被忽略，除已有相關論著的慎芝與紀利男外，⁷⁷ 已逝的梁弘志、馬兆駿等人亦有研究的價值。

不過，17 世紀歷史人物由於資料蒐集，以及古荷蘭語、古西班牙語的解讀不易，相關研

⁷⁵ 蔡秀美，〈從許丙丁的漫畫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興大歷史學報》28（2014年6月），頁51-92。

⁷⁶ 劉永楸：福建人，美國哈佛大學衛生工程碩士，1945年來臺，參與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工程規劃，在臺灣省建設廳副廳長任內，協助推動石門水庫、中興新村等多項建設。1957年應聯合國聘請擔任援外衛生工程顧問，先後在中東、非洲等地從事上、下水道與自來水系統發展。1970年自聯合國退休定居美國，1972年返臺接受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78年退休。

⁷⁷ 汪其楸，《歌未央：千首詞人慎芝的故事》（臺北：遠流，2007）；紀利男口述，蕭淑貞、吳明德撰述，《音樂人生：紀利男生命的交響樂章》（臺北：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2017）。

究缺乏，除了翁佳音、康培德等人熟悉古荷蘭語之外，這個領域亟待新進研究者投入。

（七）區域人物與家族史

由於地方學研究風氣興盛，桃園學、竹塹學、臺中學、嘉義學、金門學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均定期召開，彰化學叢書在林明德教授、作家康原支持下，由晨星出版社出版 50 冊相關著作，近年來《宜蘭文獻雜誌》、《竹塹文獻雜誌》、《臺南文獻》、《嘉義研究》、《屏東文獻》等地方文史刊物亦持續發行，使區域人物與家族史之研究成果有固定發表的舞臺，但在量的普及之餘，如何追求質的提升，是必須思考的課題。

另外，基於自身血緣，具備書寫動力而搜集到外人無法採集的史料，或走訪傳主曾經居住之地，內容豐富的有郭松年為父親郭雪湖書寫的傳記，以及李根培書寫的李偉光(李應章)，皆超越人物研究，幾近家族史的格局。前者介紹郭雪湖及其妻林阿琴，子女郭禎祥、郭香美、郭松年一家藝業及郭松棻的文學發展；後者則網羅彰化二林一地文人，並介紹李偉光在臺灣及中國二地的際遇及家庭狀況，是區域人物中耳目一新的成果。

學院的家族史碩士論文，近兩年侷限於單一人物為主，雖有一手史料及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但除了林萬掌家族之外，在論述中未見微觀與宏觀兼具的敘史基調。家族史研究為具體而微的臺灣史，有持續推動的必要性，如何深化地方學與家族史研究，仍有待專案的踏查與推行，透過系統的累積與整合，才能尋找永續經營的活力，近年臺灣地方志的纂修及國家文化記憶庫的執行是可持續的方向。

（八）大眾史學的勃興

近兩年不乏已逝政治人物的通俗傳記出版，例如余登發、盧修一、陳定南，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傳記是另一類出版大宗，例如林連宗、蘇友鵬，事實上不管學界研究風向如何轉換，此類作品向來為一般大眾所關切，而有其市場，成為屹立不搖的出版類別。再如，戒嚴時期黑名單政治受難者的陳婉真，以其親身經歷評介底層的政治運動者，其深富情感的報導文學總引人入勝。另外，企業家為創始者夫婦留史的傳記，雖有溢美之辭，但成功者傳記較學術論文更具廣泛閱讀群。

（九）基督教人物研究可再深入進行

雖然王右軍的梅監務研究已利用《臺灣教會公報》與「賴永祥長老史料庫」，潘國明的花翹奇研究注重教會長老的口述資料，但仍有不少基督教傳道、信徒的生平事略被人忽略，或是鮮少利用這些研究成果。此外，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特藏中心收藏 150 餘年來英國來臺宣教士寄回英國長老會總會的報告、紀錄、照片、信函、書籍、圖表等資料，這批史料記錄包含「臺灣民主國」時期的官方公文書，以及宣教士信函中討論原住民、婦女醫療與教育、熱帶衛生、宗教與文化等珍貴的第一手觀察，據此可深入研究蘭大衛 (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 與連瑪玉 (Marjorie Learner, 1884-1984) 夫婦、蘭大弼 (David Landsborough IV,

1914-2010) 與高仁愛 (Jean Murray Landsborough, 1920-1993) 夫婦等宣教士之事蹟與對臺灣的觀察。

(十) 人物比較研究

許雪姬曾比較過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位文化人，黃富三則比較林獻堂與廖文毅這兩位臺人菁英，因此人物研究除以個案的方式進行深入探討外，不同人物的比較亦是未來可以開展的方向，例如蔣渭水與林獻堂的比較。

(十一) 非史學界的系列叢書

值得一談的是，2010 年起，國立臺灣文學館開啟「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纂計畫，截至目前已累積出版 110 冊，近兩年則有林語堂、洪炎秋、李曼瑰、王詩琅、李榮春、吳瀛濤、王藍、郭良蕙、辛鬱、黃娟等 10 位作家資料輯的出版。此套叢書每輯包含五部份：(1) 圖片集，選刊作家的照片、著作書影、手稿、文物。(2) 生平及作品，包括小傳、作品目錄及提要、文學年表。(3) 研究綜述，綜論作家的作品研究的概況。(4) 重要文章選刊，選收具代表性的相關研究論文及報導。(5) 研究評論資料目錄，收錄相關研究文獻的書目。其中，研究綜述常指出未來可研究的方向，頗值得參考，以陳萬益撰寫之〈洪炎秋研究綜述〉為例，文中提及洪氏擔任國語日報社長，自嘲「吃國語飯」，但在政府推動國語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主張國語和方言可以並行不悖、共存共榮，引發極大爭議，因此他對國語運動的想法，仍可深入再探究。其次，洪炎秋曾出版 23 種翻譯和改寫的世界文學作品，其對兒童文學的貢獻，亦不應被忽略。⁷⁸ 總結而言，這套「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叢書，整理了現當代臺灣作家的生平、著作與研究概況，替未來作家的個案研究打下良好的地基。

國立臺灣美術館出版的「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這一系列叢書至 2019 年亦累計出版 131 冊，以及 41 部資深藝術家影音紀錄片。2018 年至 2019 年共有 20 本傳記，計有吳景欣《融會·至真·蔡雲巖》、陳長華《浪漫·夢境·許武勇》、鄭芳和《鐵焊·超越·高燦興》、王偉光《建構·空相·李德》、蕭瓊瑞《吾土·笙歌·劉耕谷》、廖新田《痕紋·印紀·周瑛》、劉永仁《低限·無限·李再鈞》、潘潘《寂靜·沉思·陳景容》、徐婉禎《色彩·人間·謝里法》、盧梅芬《傳譯·詩意·撒古流》；郭博州《絕對·奇安·趙春翔》、施慧明《嫋嫋·清音·陳敬輝》、李欽賢《礦夫·掘夢·蔣瑞坑》、劉永仁《微象·鏡映·姚慶章》、盧梅芬《尊嚴·容顏·哈古》、林育淳《蓬萊·大觀·鄉原古統》、蔣伯欣《綠舍·創型·莊世和》、潘潘《曼妙·彩影·沈哲哉》、白適銘《春望·遠航·秦松》、蕭瓊瑞《迴旋·婉約·黃潤色》。

從收錄的藝術家可見叢書基調在爬梳其成為大家的過程，從個人家世到藝業涵養以及師承脈絡的過程，均納入社會背景的考量以求生命史的完整重現，而論述作品時會融入世界藝

⁷⁸ 陳萬益，〈洪炎秋研究綜述〉，收入陳萬益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2 洪炎秋》(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頁 97-105。

術史的脈絡書寫，以建構多元的史觀。從傳記中可見臺灣美術史在日治時期新美術運動後，第一代到第二代藝術家的養成過程，以及 1949 年前後海納自日本及中國的影響。而近兩年更注意原住民與女性的成就，收入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ijung, 1960-）、哈古（Haku, 1943-）二位原住民，前者為生活美學「總體營造」的先鋒及「部落有教室」的倡議與實踐者；後者則透過雕刻重建頭目與族群的尊嚴。而女性作家，前幾年收錄陳進與吳李玉哥，黃潤色（1937-2013）是再成書的一位，她為日治文協戰將黃呈聰之女，戰後以抽象繪畫成名的女性藝術家。

這套叢書的另一共同點，即不論本省或外省籍畫家，常受政治干擾創作或具體迫害，如 1950 年代省展發生「正統國畫論爭」事件，以劉國松為代表的外省籍畫家抨擊本省畫家代表受日本奴化的「偽傳統」。王白淵、林玉山、郭雪湖等人回擊，認為日本畫為中國繪畫北宗系統，仍屬同一文化認同，迨 1983 年林之助提議將省展區分為國畫、膠彩二部才告平息。此事影響甚鉅，在蔡雲巖（1908-1977）、陳敬輝（1911-1968）、沈哲哉（1926-2017）、劉耕谷（1940-2006）多人的傳記皆論述此事波及藝業，謝里法（1938-）受政治干預及國外思潮刺激，乃著手臺灣美術史的寫作。⁷⁹ 而具體的迫害事件有 1960 年的「秦松事件」與 1985 年的「李再鈐雕塑改色事件」。⁸⁰ 多位藝術家選擇離開臺或身為黑名單無法回臺，其際遇即表現在畫作，藉以反映時代、寫照土地和表現自我。

五、結論

2018-2019 年的臺灣歷史人物與家族史研究，共有 186 篇／本相關作品，涵蓋早期與清代人物、乙未戰爭人物、政治、經濟、跨域流動、社會領導階層與地方菁英、女性、原住民、宗教、學術、文人作家、藝術、體育、家族史等十三大類，其中以藝術、文人作家、政治、跨域流動、學術的篇數較多，反映學界目前的研究取向。

在眾多作品之中，有幾篇翻案文章，其對歷史人物的深入爬梳，顛覆或補充過往的既定印象。其次，有不少研究者採取新穎的研究方法或多元視角來詮釋歷史，例如運用數位人文方法、以長時段檢視歷史、以日人視角觀察臺灣、利用外文資料或非文字資料進行研究、盡量在既有研究人物上尋求創新題材等等，均提供後輩研究者不少可借鏡之處。

在研究趨勢方面，日記研究、女性研究、區域人物與家族史均卓然有成，但日記研究應在林獻堂、張麗俊、吳新榮、黃旺成日記之外，再開發其他已出版或出土日記的研究題材；女性研究則應跳脫閨秀或名門之後，再去開拓其他職場的女性；區域人物與家族史宜在傳統的論述模式之外，呈現微觀與宏觀兼具的敘史基調。此外，跨域流動人物研究的盛行，反映

⁷⁹ 吳景欣，《融會·至真·蔡雲巖》（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頁 124-130；施慧明，《嫋嫋·清音·陳敬輝》（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頁 91-96；潘禧，《曼妙·彩影·沈哲哉》（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9），頁 26-28；蕭瓊瑞，《吾土·笙歌·劉耕谷》（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頁 12-25。

⁸⁰ 1960 年 3 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大規模的現代藝術展覽，秦松作品遭梁又銘兄弟指稱畫作《春燈》中藏有倒寫的「蔣」字，涉及毀謗國家元首，導致原欲成立的中國現代藝術中心胎死腹中。而 1985 年李再鈐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時，有觀眾投書認為作品從某個角度看起來像是當時被視為禁忌的紅色五星，時任代理館長蘇瑞屏指示將作品改塗成銀色，直至 1986 年 9 月 4 日終於恢復原來的紅色才落幕。

目前臺灣史研究的潮流，顯示學界關注的焦點不再侷限於在臺灣的臺灣人，而延伸至臺灣人的海外經驗與在臺灣的外籍人士。至於藝術人物、文人作家的研究成果豐碩，則顯示在政治、經濟、學術等傳統史學領域之外，文化方面的研究已卓然有成，特別是國立臺灣美術館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分別替藝術家、作家蒐集資料立傳，編成系列叢書出版，是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不同領域或跨學科可為人物研究增強對話，一般歷史研究者不能無視這一新動態。

綜觀 2018-2019 年的臺灣歷史人物與家族史研究，雖然學界重量級大老的作品不多，亦乏收錄於科技部評定之第一、二級期刊的論文，但仔細檢視相關研究成果，仍可發現目前臺灣史學界的研究趨勢，且不少作品無論在史料運用、方法、視角上均有可取之處，凡此均值得學界參考。